

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鬥爭(1927-1949)*

蔣寶麟**

摘 要

從 1927 至 1949 年，國立中央大學（南京，抗戰期間內遷重慶）校園內始終存在國民黨組織。戰前，雖然國民政府在教育行政層面加強對高等教育的統制，但中央大學內的國民黨組織力量十分薄弱，區黨部組織與學校行政當局幾無制度關聯。相反地，校方往往對黨部的各種活動每多掣肘。同時期，中共組織在首都難以生存。抗戰爆發後，中央大學出現一個新的變化，就是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校內建立直屬區分部和支團部。這不僅是校內黨團組織隸屬關係的改變，更表明國民黨組織力量的擴張。同時，中共組織也在校內重建。總體而言，越到抗戰後期，中共公開的組織發展和活動就越處於劣勢。然而，校內中共及左翼學生團體的潛在力量始終沒有被徹底摧毀，並在戰後得以延續和加強。另一方面，戰時國民黨和三青團勢力在校園迅速擴展，黨團員數量和活動在短時間內堪稱可觀；但從政治操作層面觀之，國民黨和三青團在校園內動員力量尚屬有限。戰後，中大校內的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並未因實行「憲政」而退出學校，同時中共地下黨和外圍組織在校內恢復，活動能力陡增。在內戰的背景下，校內政治鬥爭愈益激烈。

關鍵詞：國立中央大學、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

* 本文承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梁元生教授、葉漢明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李玉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教授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國台教授指點；五位匿名審查人（2009年3月，2011年5月）予以重要的修改意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士曾冠傑先生提供部份資料並與我分享研究心得，受益良多，謹此一併深致謝意！

收稿日期：2011年1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年7月11日。

**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引言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共第一次合作（「容共」）正式確立。此後在兩黨共同推動的國民革命過程中，群眾運動成爲其重要的組成部份。一全大會召開前，中國國民黨（1919年成立）的組織力量本以知識階級爲基礎；¹改組之後，國民黨在學界的影響更爲擴大，動員和組織青年學生入黨從事革命活動，推動國民革命全面展開。學生加入國共兩黨從事革命活動成爲當時學生政治的主流趨向。由此，政黨開始直接進入學校建立組織並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政治活動，由政黨組織和動員的在校學生成爲參與政治的重要力量。

中央大學爲1927年鼎革後國民黨直接改組而成的「首都最高學府」。在一般性的敘述中，中央大學多被認爲「由國民黨直接控制」，或抗戰勝利之後中共和左傾學生逐漸在校內佔據政治優勢。這種認識一方面與以單純學生運動（學潮）視角看待問題有關；另一方面也表明，對國民黨與大學關係的考察，還須將目光下移到微觀層面。若兼顧校內國民黨組織形態和國共關係，可以發現一直到1949年，在不同的時間段會呈現出不同的樣態。

關於民國時期大學校園內的國民黨組織，既存的專門研究並不多，部份原因是相關史料較爲分散，且若干重要檔案長期未能公布。

呂芳上曾對北伐前後國、共、青三黨動員學生運動問題有過深入的研究，其中涉及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在上海和廣州等地的大學內所設立的區黨部組織。²抗戰時期，國民黨中央有意在大學內發展組織，國共兩黨在校園內的鬥爭亦日益激烈。胡國台較早利用台灣法務部所藏國共兩黨檔案，從政策和實態

¹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上冊，頁5。

²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264-281。

兩方面，細緻考察了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高校中的鬥爭情況。³近期，王奇生對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國民黨組織進行了深入的個案研究，揭示一些與以往不同的新面相，但其對全面抗戰爆發前和抗戰勝利後全國範圍內大學黨部設置情況的推測，並不準確。⁴本文將立足 1927 至 1949 年整個時間段，在儘可能利用現存（可開放）各方資料的基礎上，詳細考察中央大學內國民黨組織（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形態和政治活動，兼及校內國共之爭，並修正某些「說法」和推論。

二、抗戰前中央大學內國民黨組織的演變

王奇生認為，戰前國民黨基本上沒有在學校建立基層黨組織，全國大學和專科學校中，可能只有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設有區黨部。⁵然揆諸史實，此一推論並不準確。1924 年 1 月，國民黨中央青年部正式成立，此後有個別學校出現國民黨區分部組織。1923 年 12 月 29 日，國民黨在上海大學內成立國民黨上海市第一區分部。在短時間內，廣州和上海兩地的學校區分部普遍建立。⁶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曾言，北伐期間「在全國中等以上各校都有本黨的基本組織」。⁷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時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的羅家倫曾對大學中的國民黨組織有過一些觀察：「目前各國立大學中，黨的勢力在學生中，非常薄弱，遍歷各處，均覺如此，即大學校長為忠實黨員，但終不能積極參與黨部工

³ Hu 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June 1989), pp. 300-323。中譯為〈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高校裏的鬥爭〉，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第 19 輯。

⁴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25-147。

⁵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27。

⁶ 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頁 266-272。

⁷ 葉楚傖，〈向學界報告幾點〉，《中央週報》，民國二十年新年增刊（1931 年 1 月），頁 14。

作，在校內之區黨部或區分部，力量薄弱，精神渙散，為一般現象。」⁸由此可見，羅提及各國立大學中的區黨部或區分部，表明在戰前國民黨黨部組織已在國立大學內設立。如中山大學，早在北伐前（廣東大學時期）已設立由中央直屬的特別黨部，其後又取消特別黨部，校內黨員改隸廣州市黨部下屬的區分部。至鄒魯長校後，他呈准國民黨西南執行部，重新在校內組織直屬於國民黨中央的區黨部。⁹況且在抗戰時期，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也稱：「本來學校黨務，早已存在」，抗戰時期在學校推進黨務「不過是繼續工作，並非創新」。¹⁰

就中央大學的情形而言，其前身東南大學內就有國民黨的組織活動。據當時東南大學學生國民黨員李清棟回憶，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東南大學中，楊杏佛、陳佩忍和顧實等教授為國民黨老黨員。在國民黨改組後，楊杏佛等人即在學生中發展黨員，並在校內建立國共合作的國民黨黨部。¹¹1925年東南大學爆發的「驅郭易長」風潮，由國民黨策動，校內黨員直接參與。在此之後，隨著國民革命影響的深入，校內的黨派分際愈發明顯，學生政治活動頻繁。¹²

1927年3月，北伐軍克復南京，東南大學隨之被查封。同年7月，被國民黨稱為「東南學閥反動大本營」的東南大學，在接受革命改組並與江蘇省內8所公立學校合併之後，正式成立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後更名江蘇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四中甫建立，校內就有建立黨部之議。物理系副教授吳有訓在9月20日召開的大學本部臨時教務會議上提議：「本校教授中老黨員發其〔起〕

⁸ 羅家倫，〈整頓大學教育意見書（1931年）〉，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冊1，頁491。

⁹ 鄒魯，〈中山大學概況（在西南各機關聯合紀念周報告，二十二年四月四日）〉，引自氏著，《回顧錄》（南京：獨立出版社，1946），冊2，頁425-426。

¹⁰ 朱家驊，〈學校黨務的詮釋——在中央電台廣播講詞（1940年6月22日）〉，收入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頁444。

¹¹ 李清棟，〈我對南京高師和東南大學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第11輯，頁131。

¹² 詳見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台北：國史館，1995），冊2，頁128-160。

組織大學特別黨部，以黨國大義貫徹全校師生之精神。此事請校長直接與中央黨部接洽。」¹³隨後，在 10 月 24 日召開的大學第三十八次籌備會議上，會議主席胡剛復再次提出在校內設立黨部，決議先組織「黨務委員會」研究其事，推定校長張乃燕、陳劍脩和吳有訓等 8 人為調查委員。¹⁴11 月 1 日，第四中山大學致函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派秘書長劉藻彬前往接洽組織特別黨部事宜。¹⁵11 月 25 日，中央組織部覆函四中：「關於貴校黨部組織事宜請逕與南京特別市黨部接洽可也。」¹⁶由此可知，第四中山大學未能在本校內成立直屬於中央的特別黨部。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市原隸屬於江蘇省。因建都關係，南京於 1927 年 6 月改設特別市，直屬中央政府。為配合特別市的行政建制，南京市的國民黨組織改設直屬於國民黨中央的特別市黨部。

由於四一二之後南京國民黨實行「清黨」，南京特別市黨部並未立即成立，而是先成立南京特別市清黨委員會。與「清黨」同時，因各省市黨組織尚未健全，亟待改組，由中央組織部另派改組委員（或特別委員、籌備委員、臨時執行委員）分別進行。吳倚滄等五人為南京市黨部改組委員。1927 年 9 月，寧漢合流，蔣介石下野，南京國民黨中央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在中央特別委員會時期，地方黨員改弦更張，特委會派朱丹父等九人為南京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1928 年 1 月初，蔣介石復出，中央特別委員會取消。至此，黨務政策再次改變，中央組織部向南京派出黨務指導委員會，舉行黨員登記。¹⁷南京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於 1928 年 7 月完成第一次黨員總登記後，即著手組織下級黨部。1929 年 1 月，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正式成立。¹⁸

¹³ 〈大學本部臨時教務會議紀錄（1927 年 9 月 20 日）〉，《第四中山大學教育行政週刊》，期 15（1927 年 10 月 31 日），頁 10。

¹⁴ 「十月廿四日第三十八次籌備會議紀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檔案〉，648-906。本文使用該檔案全宗均為縮微膠捲，以下引注逕稱〈中大檔〉。

¹⁵ 「函中央黨部組織部」，1927 年 11 月 1 日，〈中大檔〉，648-2222。

¹⁶ 「中央組織部函第四中山大學」，1927 年 11 月 25 日，〈中大檔〉，648-2222。

¹⁷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冊，頁 109-122。

¹⁸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十八年）》（南

根據 1929 年 6 月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下轄 12 個區黨部。¹⁹而據 1930 年 11 月中央組織部的報告，南京特別市黨部下轄 11 個區黨部。這是由於 1929 年 11 月中央政治學校區黨部從南京市黨部劃出直屬中央的關係。²⁰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下設各區黨部於市區各地，其中第八區黨部所標位址為中央大學。²¹現將第八區黨部所轄區分部列表如下：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黨部各區分部概況表(1929)

區分部名稱	地址	區分部名稱	地址
第一區分部	中大第一宿舍	第九區分部	四牌樓測量局
第二區分部	中大第一宿舍	第十區分部	洪武街一六號
第三區分部	中大第一宿舍	第十一區分部	蓮花橋實驗學校內
第四區分部	中大舊交通處	第十二區分部	馬標中央軍校軍官研究班
第五區分部	中大舊交通處	第十三區分部	成賢街中央研究院
第六區分部	中大田字房	第十四區分部	一枝園二十三號
第七區分部	成賢街教育部	第十五區分部	一枝園二十二號
第八區分部	大石橋五號	第十六區分部	一枝園二十三號

資料來源：〈各區分部一覽表〉，《南京黨務週刊》，期1（1929年6月3日），頁29-30。

從上表顯示的內容看，第八區黨部第一至六區分部位址均在中央大學內；第十一區分部和第八區分部應該也算在中大範圍內。因此可以說，中央大學內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分為若干區分部，並屬同一個區黨部，但該區黨部組織範圍要超出中大。

至於第八區黨部成立的時間，據校友梅麟高回憶，他在 1929 年 3 月至 1930 年 12 月曾擔任第八區黨部籌備處第一、二、三屆執行委員會秘書，並當選第八

京：編者自刊，1929），第 2 編，頁 589。

¹⁹ 〈各區黨部一覽表〉，《南京黨務週刊》，期 1（1929 年 6 月 3 日），頁 22。

²⁰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冊，頁 281、194。查南京市第十二區黨部設於紅紙廊，時為中央政治學校所在地。中央政治學校於 1929 年 11 月正式成立中央直屬區黨部。

²¹ 〈各區黨部一覽表〉，《南京黨務週刊》，期 1（1929 年 6 月 3 日），頁 22。

區黨部第五區分部第一、二、三、四屆執行委員，負責徵求在校員生入黨。²²可見第八區黨部的籌建工作當在 1928 年 3 月左右。1928 年 10 月 17 日，南京特別市黨部指導委員會組織部長段錫朋曾致函中央組織部，稱「各下級黨部組織完成以來時近兩月」，²³這說明南京各區黨部正式建成的時間在 1928 年 8 月左右，要早於南京特別市黨部正式成立的時間。

1933 年，根據國民黨中央「改善縣市以下黨部組織暨活動方式」的規定，指定南京市為試辦區域之一。依此，南京市各區黨部進行重行劃分，全市劃分為 9 個區黨部，各區黨部下設若干區分部，一律秘密設立。²⁴據《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區劃分辦法》規定，新的第八區黨部設於中央大學內，「區內黨員之劃分係以學校為標準，即凡在中央大學之學生或教職員，無論其住址如何，一律劃入本區」。²⁵該年 5 月，國民黨南京特別市正式劃分新黨區，中央大學設第八區黨部，下設 10 個區分部（包括畢業同學會和農學院），其中校本部有 7 個區分部。²⁶

在重新劃分黨區後，南京市的國民黨組織系統基本保持穩定。不過，黨員人數和基層黨組織本具動態性，且尚未覓得完整統計數據，因而很難對抗戰前中大內的國民黨員和黨組織完整地描述。據南京市檔案館藏 1936 年 11 月〈八區黨部名冊〉顯示，當時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黨部下設 10 個區黨部，其中第一至第八區分部設於中央大學內，第九區分部設於中大實驗學校，第十區分部設於中大農學院。從該名冊所載黨員的身分來看，並非所有黨員均是中央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其中亦包括畢業生、校友和黨政機關職員。以第二區分

²² 梅麟高，〈大學生活之回憶〉，《中外雜誌》，卷 19 期 5（1976 年 5 月），頁 70。

²³ 「南京特別市黨指委會組織部段錫朋呈中央組織部」，1928 年 10 月 17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檔案〉，717(4)-410，下文引用逕稱〈中央組織部檔〉。

²⁴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廿三年）》（南京：編者自刊，1934），第 3 編（丙），頁 138-139。

²⁵ 「南京特別市黨部呈中央組織部附〈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區劃分辦法〉」，1933 年 4 月 24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410。

²⁶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密函（組字第 695 號）附吳懋祖報告」，1933 年 5 月 23 日，〈中大檔〉，648-2231。

部為例，該組織共有國民黨員 25 人，其中中央大學學生黨員 4 人（含畢業生 1 人），教職員校工黨員 7 人，其他黨員則有 15 人，如國民政府文官處科員、行政院編審和考試院秘書等。據統計，當時第八區黨部共有國民黨員（含預備黨員）223 名，其中中央大學教職員、校工、和學生黨員（含實驗學校和農學院）為 149 人。²⁷另據〈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各分部組織概況表〉（時間不詳），第八區黨部的組織系統與前述資料所示略有不同：第一至第七區分部設於中央大學內，第八區分部設於中大畢業同學會，第九區分部設於中大實驗學校，第十區分部設於中大農學院。該資料顯示的第八區黨部黨員人數為 220 人，數據和前述資料差距不大。²⁸

1928 年國民黨成為全國性的執政黨後，改變了國民革命時期的黨政關係，在中央層級以黨治政，在地方層級黨政分治，地方黨部不得干涉地方行政。這種黨政分離的架構造成國民黨地方組織的黨權薄弱，以及地方黨政間的衝突。²⁹從國民黨的地方黨務系統結構看，省縣市一級黨部與同級政府相對應，法理上雖存「黨政分治」，但無論是合作還是衝突，彼此尚有聯繫的鏈條。相較而言，基層的區黨部和區分部的劃分則與地方行政部門無對應關係。以 1933 年南京市重新劃分黨區的情況來看，第一至第九區黨部分別設於大倉園荷花塘、娃娃橋、市政府、下江考棚、跑馬巷、中央黨部、下關興中門小學、中央大學和國民政府。³⁰譬如設於中央大學內的南京市第八區黨部，只與校內國民黨員發生組織關係，校方與區黨部不存在任何性質性的「指導」或「監督」關係。再如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市黨區調整前，教育部黨員屬第八區黨部第七區分部，而調整後劃歸第一區分部，分設第十七和十八區分部。³¹且國民黨

²⁷ 「八區黨部名冊(1936年11月)」，南京市檔案館藏，〈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檔案〉，1038-1-169。

²⁸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各分部組織概況表」，南京市檔案館藏，〈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檔案〉，1038-1-205。

²⁹ 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180-199。

³⁰ 〈京市重劃已定，各級黨部限期成立〉，《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5月22日，第2張第3版。

³¹ 「南京特別市黨部呈中央組織部附〈新舊區分部名稱預定對照表〉」，1933年4月24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410。

在中國大陸執政時期，從無「以黨治校」之說。因此，國立中央大學雖在教育行政上直屬教育部，但二者內部的黨務系統沒有任何統屬關係。

事實上，中大內的黨部組織與校方的聯繫並不密切，有時甚至會發生牴牾。1928年10月8日，第八區黨部致函中央大學，指出「本區內一切宣傳統由本會擔負指導及監督之責」。中央大學發行的《日刊》，「過去在內容及編輯方面皆確有未能盡合黨義之處，如登載國家主義論文之類已屬於屢見」，須行整理：「（一）大學日刊在言論上應多為國民革命之宣傳及三民主義之闡發，使學生思想得所指歸，而收默化潛移之效；（二）大學日刊在編輯上最妥洽之辦法為以編輯之全權付諸本會妥慎辦理，以應民眾及本黨同志之要求。」³²對此，校長張乃燕很不以為然，覆函云：「敝大學為學術機關，此項日刊係報告校聞及討論學術之性質，與宣傳性質稍有不同。既以大學命名，應由大學負其責任，編輯之權自難屬諸他人，故對於貴會第二項辦法，未便接受。至第一項辦法，自當多多注意。」³³

1929年10月底11月初，第八區黨部準備召開黨員大會進行選舉，該區黨部的中央大學學生礙於校規，不能在上課期間參加選舉，致使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兩次。鑒於此，第八區黨部曾派員前往中大接洽，希望黨員學生能獲准停課參加選舉，但遭校方拒絕。³⁴經過再次斡旋，中大校方才同意「出席黨員大會之學生，准其一體到會選舉，不作請假缺課論」。³⁵

1927年國民黨「清黨」造成政權內部分裂，黨組織系統的相對激進和權力部門的相對保守，在地方黨政關係上表現得尤為明顯。³⁶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最初幾年就顯現激進的一面。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學學生發起針對

³²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黨部函中央大學」，10月8日，〈中大檔〉，648-2219。

³³ 〈張乃燕致國民黨南京市第八區黨部函（1928年10月16日）〉，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中央大學史料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上卷，頁339-340。

³⁴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公函（第二〇七號）」，1929年11月16日；「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函國立中央大學」，1929年11月19日，〈中大檔〉，648-2231。

³⁵ 「國立中央大學函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1929年11月20日，〈中大檔〉，648-2231。

³⁶ 楊奎松，〈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運動研究〉，《歷史研究》，2005年第6期，頁61-62。

學校當局的「免費運動」。校方因此開除的兩名學生，其中一人徐毅生即國民黨員，並曾任南京特別市黨部第八區分部候補監察委員和監察委員。³⁷在此運動過程中，學生以「本三民主義革命精神，減輕學生負擔，實行總理教育平民化之主張」，向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尋求奧援，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特致函校長張乃燕，認為學生要求免收學費「尚非過分請求」，黨部「極表同情」，希望校長斟酌後准學生所請。³⁸而在同年4月，因大學院改第四中山大學為「江蘇大學」而爆發的另一場學生抗議活動中，學生群體除了仍以「黨化學校」和總理遺教為思想武器之外，³⁹有國民黨學生將「江蘇大學」校牌抬至大學院門口，並將之踏毀。⁴⁰

相較而言，中央大學校方，特別是首任校長張乃燕就顯得有些「保守」，有時還被視為有意壓制校內的國民黨勢力。1927年5月初，新的江蘇省政府成立後，張擔任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他在省政府會議上就針對地方黨務和教育行政關係提議：「縣黨部不得任意變更地方教育行政」，⁴¹可見張本人並不贊同黨組織干涉教育行政。其擔任第四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校長後，在國民黨各級黨部的眼中，中大經常成為異黨潛藏或活動的基地。1928年7月，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函請大學院和江蘇省政府，「令飭中央大學校長負責將該校共黨及國家主義者澈底肅清」。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指出，中共和國家主義派在中央大學校內大肆活動，「各方面亦曾一再函告該校當局，囑其注意澈底肅清，但遲遲至今，迄未見有處置此問題之表示」，而且「堂堂中央大學學生，人數數千餘，而黨員不滿一百，向無較健全之本黨的區分部」，

³⁷ 「南京特別市黨指委會組織部段錫朋呈中央組織部附呈『各下級黨部執委更動對照表』」，1928年10月17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410。

³⁸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函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2月14日，〈中大檔〉，648-2231。

³⁹ 〈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改定校名請願代表團李鐵錚等來呈（1928年3月21日）〉，《大學院公報》，第1年第5期（1928年5月），頁50-52。

⁴⁰ 梅嶙高，〈大學生活之回憶〉，《中外雜誌》，卷19期5，頁68。

⁴¹ 〈省政府第十三次政務會議紀錄（1927年6月7日）〉，《江蘇省政府公報》，期2（1927年9月22日），頁17（欄頁）。

指責校方不履行「黨化教育」。⁴²1930年底，因各種錯綜複雜的原因，張乃燕下台已成定局，蔣介石公開指責中央大學已「校風敗壞」，而且其早在兩年前已調查得知該校「管訓廢弛，國家主義派、改組派、共產黨混跡期間」，校長張乃燕應負全責。⁴³

或出於特有的政治敏感，蔣介石所云或有誇大成分，但所涉中央大學內的「改組派」勢力卻並非空穴來風。改組派是國民黨內的左傾派系，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成立於1928年初，以擁護汪精衛為號召，主要成員為陳公博等人。1930年中原大戰後，改組派逐步瓦解。⁴⁴因其堅持革命和繼續發動民眾運動的左派政治主張，對一些中下層黨員和青年學生頗具吸引力。和許多國民黨地方黨部的情形相似，在中央大學內的國民黨組織中，改組派在一段時間內亦有相當勢力。⁴⁵1928年秋，改組派開始在南京發展組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發展會員五六百人，其中中央大學有會員七八十人，成立分部，由吳健任書記，組織活動採秘密形式。⁴⁶

1929年3月14日，南京市改組派為反對國民黨三全大會指派代表，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召開大會時，吳健及中央政治學校谷正綱策動反對蔣介石，當場引發改組派與擁蔣派的惡鬥。這一事件之後，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公開決裂，改組派成員多被開除黨籍，各區黨部負責人大部份辭職。⁴⁷當時，國民黨南京

⁴² 〈嚴密查辦中大反動派〉，《江蘇省政府公報》，期43（1928年7月23日），頁13-14。

⁴³ 〈蔣主席對中大風潮態度〉，《申報》，1930年11月3日，第3張第9版。

⁴⁴ 關於改組派的簡史，可參考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收入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34-45。

⁴⁵ 據蘇維初的統計比較，改組派成員在整個國民黨組織中人數比例很少，改組派人數較多的南京、上海兩市，也只有國民黨員總人數的10%左右。參見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5.

⁴⁶ 何漢文，〈改組派回憶錄〉，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第17輯，頁172-173。1929年6月國民黨南京市各區黨部統計顯示，吳健為第八區黨部訓練委員。見〈各區黨部一覽表〉，《南京黨務週刊》，期1（1929年6月3日），頁22。

⁴⁷ 何漢文，〈改組派回憶錄〉，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頁174-175；武和軒，〈我對改組派的一知半解〉，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2），第36輯，頁150-151。

市第二、三、五、七、八、九、十一等區執行委員聯名繳印離職，其中第八區黨部吳健、李楚林因繳印離職而受南京市黨部處分。⁴⁸

1930 年底，第八區黨部指控原該黨部常務委員林群係改組派成員，要求中大校方將其撤職查辦（林群時任中大實驗學校副主任）。林被控的罪狀之一即與吳健等人在中央大學內組織「極光社」。⁴⁹據 1931 年秋從上海光華大學轉入中央大學的郭驥回憶，此前校內有兩大政治性學生團體：極光社（接近改組派）和新聲社（靠近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二者鬥爭得十分激烈。當時仍有一個叫民力社的組織存在，其成員與之前的極光社有關。⁵⁰

隨著中原大戰後改組派勢力在全國範圍內的衰落，中央大學內改組派存在的時間並不長。然在其後時段中，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並無特別明顯的活動。校友祝樞壽指出，在中大校內，「正宗的國民黨員，並非沒有，並且為數也不在少數，不過校內黨部負責的機構，有些衙門化，各級的主幹同志，也有些官僚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在政治的鬥爭上是不能顯示出應有力量來的。」⁵¹

三、戰時國民黨中央大學直屬區黨部及其活動

前述羅家倫在考察各大學黨務情況後，判斷頗為悲觀，因而提議「中央黨部應注重各國立大學黨部」，並將大學黨部改為特別黨部，直接隸屬於中央。⁵²羅家倫的提議並未引起國民黨中央的重視，而且當時的社會輿論對大學中的黨爭和政爭活動也多持貶抑態度。然時過境遷，抗戰爆發後羅家倫八年前的提議終成現實。

⁴⁸ 〈過去一周間黨務政治報告（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南京黨務週刊》，期 18（1929 年 9 月 30 日），頁 33。

⁴⁹ 「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黨部執行委員會公函」，1930 年 10 月 22 日，〈中大檔〉，648-2226。

⁵⁰ 郭驥，〈學生生活的回憶〉，收入中大六十周年校慶籌備會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國立中央大學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中壢：中央大學，1975），頁 19。

⁵¹ 祝樞壽，〈吾愛吾師——記愛國學人何浩若老師〉，收入中大六十周年校慶籌備會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國立中央大學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中壢：中央大學，1975），頁 124。

⁵² 羅家倫，〈整頓大學教育意見書(1931)〉，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冊 1，頁 491。

1938年底，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開始注意辦理學校黨部籌備工作。⁵³1938年12月22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常會第一〇六次會議通過《籌設各專科以上學校及國立中學直屬區黨部組織辦法》。⁵⁴1939年6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二三次會議決議設立直屬國立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及第八中學四校區黨部，派何義均、王書林、湯宗舜為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籌備員。⁵⁵

1939年12月10日，中央大學召開黨員大會，選舉執行、監察委員，正式成立直屬區黨部。黨員大會出席國民黨黨員共56人（此外還有10名黨員請假，37名缺席，另有11名新黨員宣誓入黨）。大會由何義均主持，校長羅家倫代表國民黨中央指導並監選。最後，大會投票選舉產生了區黨部執監委員。1940年1月16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正式對中大區黨部予以核準備案。⁵⁶截至1940年7月底，共有16所學校成立區黨部，其中中央大學成立最早。⁵⁷經選舉產生的中央大學直屬區黨部執監委員的履歷如下：

執行委員

何義均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本校法律系專任教授（任執行委員會書記）

王鴻益 中央大學教育系四年級肄業（即在讀學生，下同），曾任江蘇省立鎮中附小教導及研究主任

謝崑 中央大學教育系四年級肄業，曾任湖南省技術輔導團第五六分團主任輔導員（任宣傳）

孫祁 中央大學教育學士，現任中央大學教育系助教（任組訓）

⁵³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頁11-12。

⁵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冊24，頁335。

⁵⁵ 「中常會第一二三次決議案」，1939年6月19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3/26.1。

⁵⁶ 「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籌備處呈組織部」，1939年12月11日；「組織部指令直屬中央大學區黨部（仁渝字第3600號）」，1940年1月16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⁵⁷ 〈籌備成立中央直屬學校黨部〉，《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2期37（1940年9月21日），頁15。

王書林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現任本校柏溪分校主任兼心理系教授
候補執行委員

王季高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前南昌行營設計委員，現任中大政治
系教授

唐誠 中央大學畢業，中央大學秘書兼文書主任
監察委員

童冠賢 中央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系教授
候補監察委員

羅家倫 中央大學校長⁵⁸

從以上中大區黨部執監委員的構成情況來看，教職員黨員要多於學生黨員，但在執行委員中學生還是佔到五分之二。不過，中大區黨部的學生執行委員王鴻益和謝昆在入大學前均有社會工作經歷，這也可能是其被推選成為區黨部執監委員候選人的原因。而執監委員中的教授黨員，如何義均、王書林和童冠賢等人，均是學校現任或曾任的教務、總務和訓導「三長」，並曾從事過黨務工作。

1941年3月23日，國民黨中央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召開黨員大會，舉行了第一次改選。⁵⁹中大區黨部第二屆執監委員的構成，較之第一屆的最大變化即學生黨員的比例增加。⁶⁰其中在7名執行委員中有5名為學生，且高票當選，柯榮鑫和王宏志的得票數甚至超過了黨部書記胡煥庸。造成此種情形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中央大學學生黨員人數的增長，並大幅超過教職員黨員。

為了協調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的關係，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常會第一三三次會議於1939年11月通過《黨與團之間關係及其實施辦法》，其中規定：「高中以上學校之黨部，以徵收教職員入黨為範圍，其團部以徵收在校學生入團為

⁵⁸ 〈中央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執監委員履歷表〉，1939年12月30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區黨部各委員工作分工由1939年12月18日舉行的第一次執監委員聯席會議推定。見「國立中央大學直屬區黨部呈中央組織部（呈字第一號）」，1939年12月30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⁵⁹ 「呈報選舉結果由」，1941年4月7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⁶⁰ 〈直屬中央大學區黨部執監委員履歷表〉，1941年4月7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範圍。」1940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常會第一七八次會議又通過《確定黨與團關係辦法實施細則》，再次重申在已成立三青团團部的學校內，不招收學生入黨。⁶¹但在事實上，很多大學在吸收教職員入黨的同時，仍招收學生入黨。⁶²中央大學的情況正是如此。

由於缺乏完整的資料，關於歷年國民黨中央大學區黨部黨員數目和黨員構成的情況還無法確切統計。但從已掌握的材料來看，中大區黨部第二屆執監委員改選後，到1941年11月時共有黨員134人。當時區黨部下設6個區分部，教師黨員歸入第一區分部，共33人；第二區黨部共17人（有可能是學校的職員黨員）。這樣來看，中央大學此時至少有84名學生黨員，佔黨員總數的63%。⁶³這種趨勢一直加強，到1943年2-5月間，中大區黨部共有國民黨員323人，其中學生黨員228人（佔黨員總數的70.5%），教師黨員則為95人。⁶⁴

與學生國民黨黨員相比，中央大學的教師黨員顯然在人數上略遜一籌，但若是考慮教師黨員在整個教師隊伍中的比例，也算得上是人數眾多。以1943年10月為例，當時中央大學共有學生3,200人，教職員828人（其中教師488人）。⁶⁵與上列1943年2-5月間中大國民黨員人數數據加以比照，學生黨員約

⁶¹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8），第4編，「戰時建設」（四），頁477-481。

⁶² 參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30-131。

⁶³ 「中國國民黨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呈文（煥字第二十七號）附黨員名單」，1941年11月26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⁶⁴ 「直屬中央大學區黨部概況」，〈中大檔〉，648(4)-310。按從該檔所錄中大區黨部的執監委員名單來看，應屬1942年8月經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核准後的第三屆中大區黨部執監委員會。〔〈核准各直屬區黨[部]選出執監委員〉，《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4期15（1942年8月1日），頁30〕該文件所署中大區黨部書記為周鴻經，而非黃如今。查黃如今於1943年1月赴新疆主持黨務，所遺中大區黨部書記一職由周鴻經接任。〔〈沙磁點滴〉，《大公報》（重慶）1943年1月9日，第1張第3版；「中國國民黨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第三屆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紀錄」，1942年12月29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1943年6月，中大區黨部第三次改組。〔〈中央常會核准各直屬區黨部選出執監委員〉，《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5期12（1943年6月16日），頁23〕所以可知上述〈中大檔〉648(4)-310案卷內所收之〈直屬中央大學區黨部概況〉的時間應為1943年1至5月間。

⁶⁵ 〈國立各高校學校教職員工人數表（1943年10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5輯第2編，「教育」（一），

佔學生總數的 7.12%，教職員黨員約佔教職員總數的 11.47%。到 1944 年 4 月時，中央大學的國民黨員人數已迅增至六百多人，⁶⁶故學生和教職員黨員在全校師生中所佔比重有可能更高一些。

據王奇生的統計和推算，西南聯大的教師有 40% 加入國民黨，其中教授入黨的比例可能接近 50%（1944 年資料所得）。⁶⁷由於材料的限制，對中央大學 1943 年黨員比重的統計並未將教師和職員分列，估計大學黨務對教師（尤其是教授）更為注重，因而到 1944 年中大教師加入國民黨的比例應超過 11.47%，但恐怕也很難達到聯大 50% 的比率。

在時人心目中，中央大學在象徵意義和實際政治上均與「黨國」有極大的關聯，但中大教師入黨的比例竟大大低於號稱「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這提示我們對於戰時各個大學中國民黨的動員能力還應有一番深入的探討。當然可以肯定的是，入黨教師的數量也不能完全與國民黨的在校園中活動能量和控制力的強弱等同。西南聯大有人數眾多的國民黨員教師，反而與「黨國」造成較大的疏離（至少與中大相比是如此），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大學中的國民黨影響力實在有限，且多數教師的黨員「堅貞」程度也有待進一步考察。1943 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已對大學黨務和黨員的情況很是悲觀：「大學黨務，以我們想像，一般知識水準都很高，黨的組織該很健全，但實際上，大學的黨員是否每個人完全履行對黨的義務，是否每個人按期參加黨的會議，也是大大的疑問。」⁶⁸

從表面上的人數來看，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教師黨員人數雖難望西南聯大之項背，但較之該校戰前的比例已有一定幅度的增加。⁶⁹這與當時國民黨中央

頁 761。

⁶⁶ 「彭耀昆簽呈（平渝 6757 號）」，1944 年 4 月 13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⁶⁷ 參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31。

⁶⁸ 朱家驊，〈現在地方黨務工作的方向——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央組織部第二次地方黨務工作討論會講〉，《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 6 期 10（1944 年 5 月 16 日），頁 7。

⁶⁹ 據 1936 年 11 月「八區黨部名冊」（南京市檔案館藏，〈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檔案〉，1038-1-169）所列，中央大學教師（包括教授、講師和助教）國民黨員（含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為 25 人。

在學校推行黨務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其中朱家驊的作用最為關鍵。

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朱家驊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並兼任中統局局長。1939年11月，朱家驊接替CC系張厲生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⁷⁰開始逐步掌控國民黨黨務系統。朱家驊原先與CC系較為接近，自從先後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和組織部長後，便自組班底，另樹一幟，成為戰時國民黨的一派新生勢力，並在黨務上與CC系展開了激烈的爭奪。⁷¹與CC系的職業「黨務幹部」不同，朱家驊與教育界一直以來都有很深的淵源和良好的人脈關係。朱為留德博士，又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山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和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並在戰前一度擔任教育部部長，這些資歷使得他在學術教育界有許多師生輩的朋友。當朱家驊出任組織部長後，一項重要的工作便是推進學校內的國民黨黨務。1940年2月，朱家驊在中央組織部普通黨務處成立學校黨務科，主管學校黨務工作。⁷²

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甘家馨回憶，朱家驊當時最為重視國民黨與學術界的溝通和聯合。正是由於朱家驊在教育界的特殊位置，使得國民黨「很難進門」的西南聯大和「亦比較麻煩」的中央大學都被他「拉進黨裡面來」。⁷³

從中央大學區黨部的情況來看，主要構成人員均與朱家驊本人有很深的交誼。如中大區黨部第三屆書記黃如今，在進入中大之前就是朱家驊下屬的中央組織部黨員訓練處處長。⁷⁴第一屆書記何義均、監察委員童冠賢，均為北伐前

根據1937年6月的統計，中大教員370人。（〈中央大學概況（1937年）〉，收入《南大百年實錄》，上卷，頁336）由於1936年11月和1937年6月同在一學年內，學校教員人數變動不會特別大，故基本可得出戰前中大教員中的國民黨黨員約佔總人數的6.76%。

⁷⁰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137-140。

⁷¹ 詳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322-325。

⁷² 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頁50。

⁷³ 甘家馨，〈給國民黨帶來新觀念作風的朱先生〉，《傳記文學》，卷29期6（1976年12月），頁22-24。

⁷⁴ 〈朱部長指示學校黨務方針〉，《中大週刊》，期9（1941年6月8日），第1版；〈中央第一九二次常會通過中央各部會人員任免案〉，《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6期10（1942年1月1日），頁37。

的黨務幹部；第四、五屆書記周鴻經也是中大校內地位重要的教授。他們為中大校長羅家倫所延攬，更「常被朱先生邀宴座談」。⁷⁵像童冠賢、何義均這樣的老黨務幹部和大學教授，本與 CC 系有很大的隔閡。他們在朱家驊的支持下推行學校黨務，幾乎成為中央大學的政治場域內國民黨中央派系之爭的縮影。

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胡煥庸是第二屆中大區黨部的書記，和第三、四屆區黨部執行委員、第五屆區黨部候補監察委員。胡煥庸對中央大學區黨部的組織工作有很深的介入，同時在蔣介石和顧毓琇任校長期間，長時間擔任學校的教務長，是中大大校內「南高東大系」教授的核心人物和實權派。⁷⁶據胡氏晚年的回憶，朱家驊在 1930 年任中大校長時期就對他的地理系很重視，當朱任組織部長後，「沒有徵求我同意就把我推選為中大區黨部書記」，但胡煥庸考慮到是校內工作，所以「還是接受了」。此外，胡煥庸和 CC 系的陳立夫及葉秀峰「也有些接觸」。⁷⁷

朱家驊除了利用其在教育界的人際關係，將一大批大學教授納入各個學校區黨部的領導層之外，其推行學校黨務的另一項工作即拉普通教授入黨。1939 年 3 月召開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時，蔣介石開始極力號召全國教育界人士加入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對於全國有志救國的賢智之士，始終是殷切期待，加入本黨，共同奮鬥的，尤其在此國家存亡呼吸的抗戰時間，對於全國先知先覺各大學校長教授，更切風雨同舟之感。」⁷⁸不過，已在黨國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王世杰對此卻很不以為然，認為國民黨勸請教育界人士加入國民黨，「微類逼

⁷⁵ 白瑜，〈懷念從政學人朱家驊與王世杰〉，《傳記文學》，卷 40 期 1（1982 年 1 月），頁 114。據中共方面的觀察，抗戰時期「辦黨若干年，從政十餘載的黨官和政客」紛紛進入大學校園，其中以中央大學和四川大學等校「數量最為可觀」。參見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抗戰中的中國文化教育》（抗戰書店，1940；北京：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 1957 年翻印），頁 81-82。

⁷⁶ 「吳道坤致朱家驊函」，1945 年 4 月 2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49。

⁷⁷ 胡煥庸，《胡煥庸回憶錄》（無出版地，1988，南京大學圖書館藏），頁 22-23。

⁷⁸ 蔣介石，〈總裁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的講話〉，收入教育年鑑編輯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現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86 年影印本），第 11 輯 103 號〕，冊 1，頁 83。

迫」。⁷⁹王世杰之語實道出教育界人士對於國民黨「勸請」的普遍觀感。

無論實際效果如何，國民黨拉教育界人士入黨的願望一直十分迫切。1941年9月，教育部曾專函中央大學，轉達了中央組織部希望學校方面介紹「著名人士過去□持超然態度迄未入黨者」加入國民黨的希望。⁸⁰不過，中大教授黨員雖多，但恐怕部份加入者並非都是「主動靠近」或是「心甘情願」。時為中大化學系教授的高濟宇就有被人「勸請」入黨的經歷。⁸¹

高濟宇和竺可楨等反映了戰時大學教授入黨的一種情形。但同時，國民黨的大學黨務工作還存在另一種面向。1943年3月22日，黃如今致函朱家驊，據其耳目所及，報告近期中大區黨部選舉狀況。黃如今稱此次選舉，「區黨部負責人事先秘密活動，不宣布選舉時日，此因職務上而得便利」，而且有人假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指定人選的名義活動選票，故3月22日當天改選時，「同志紛紛質問，退席者有之，責難者有之」。⁸²由此不難看出某些教授對於黨務頗為熱衷，並頗看重個人在學校黨部中的地位。⁸³

前文已述，1933年之後中央大學內的國民黨組織活動採秘密方式。1941年，中央組織部正式規定學校直屬黨部活動採公開方式。⁸⁴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國民黨中央大學直屬區黨部的常規活動，除了召開黨員全體黨員大會改選執監委員和日常的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並按照中央黨部的規定定期組織學生參加以三民主義為主題的論文和演講競賽外，最主要的特色項目便是舉辦學術講座。1941年暑假，中大區黨部曾組織「暑假學術講演會」，每天邀請本校教授或外界名流學者作專題演講。⁸⁵由中大師範學院院長許恪士主持的重慶

⁷⁹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2，1939年3月6日，頁44。

⁸⁰ 「教育部秘書處來文(33232)」，1941年9月3日，〈中大檔〉，648-2231。

⁸¹ 高濟宇，〈校事瑣憶〉，《高教研究與探索》，1988年第2期，頁1-2。

⁸² 「黃如今致朱家驊函」，1943年3月22日，〈朱家驊檔案〉，301-01-06-348。

⁸³ 此點承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教授指教。

⁸⁴ 〈各學校直屬區黨部組織辦法補充規定三點〉，《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3期4（1941年2月10日），頁10。

⁸⁵ 〈區黨部將舉辦暑假學術演講〉，《中大週刊》，期7（1941年5月25日），第2版。

沙磁區各校聯合舉辦的「沙磁區學術講演會」，⁸⁶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三青團的共同資助。該演講會開設的目的在於「對於教育學術界擴大思想指導與開展學校黨務之旨」，⁸⁷與中大校內的黨務事業也有一定的聯繫。此外，開辦暑期訓練學校也是中大區黨部的一項重要工作，並得到了中央組織部的稱讚。⁸⁸

為期適應學術教育機構的特性，國民黨中央大學直屬區黨部曾組建有各種外圍組織，一般來說，這些組織的呈現方式也是「學術性」的，由中大教授胡煥庸和徐仲年主持。其中，「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沙磁區分會」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團體，目的在於「聯絡沙磁區各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思想純正長於寫作之青年砥礪風尚，以為本黨推行教育文化」。⁸⁹

由於抗戰時期紙張和印刷資源缺乏，各種類型和內容的「壁報」成為了中大校園內學生輿論的主要視窗。其中，《建國》壁報為國民黨中大區黨部之輿論喉舌，並與胡煥庸「有關」。⁹⁰該報之立論緊跟「黨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如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之前身）成立時，便發專號予以批判。⁹¹除此之外，中大校內《新蕾》壁報和《時風》壁報也多由學生國民黨員主辦，經費由中央組織部提供。⁹²但中大區黨部的外圍組織「農社」、「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沙磁區分會」和「建國壁報社」的存在時間不長，到1943年4月之前均停止運行。⁹³

⁸⁶ 從目前所存有的史料看，第一次「沙磁區學術講演會」舉行的時間為1941年4月6日，至少到1944年5月8日，該演講會仍在繼續。參見《國立中央大學校刊》期9以下相關內容以及《國立中央大學校刊》，期10（1944年5月16日），頁4。

⁸⁷ 「黃如今簽呈」，1941年3月4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3。

⁸⁸ 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黨務報告》（重慶：出版者不詳，鉛印本，1943），頁11。

⁸⁹ 「呈中央組織部」，〈中大檔〉，648(4)-310。

⁹⁰ 「呈中央組織部」，〈中大檔〉，648(4)-310；「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呈文（中經字第121號）」，1944年3月31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⁹¹ 〈本校建國壁報二卷二期出版〉，《中大週刊》，期21（1941年12月21日），第2版。

⁹² 「呈組織部（鴻字第卅二號）」，4月6日，〈中大檔〉，648(4)-310；「呈組織部（鴻字第十九號）」，3月9日（1943年），〈中大檔〉，648(4)-310。

⁹³ 「第八次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4月14日（1943年），〈中大檔〉，648(4)-310。按該會議

國民黨中央大學直屬區黨部的經費來源全賴中央組織部提供。從 1939 年 12 月創建到 1940 年 12 月，中大區黨部每月的經費為 60 元。但從 1941 年 1 月到 6 月，經費降為每月 50 元，組織部另提供 1941 年 4 月到 6 月區黨部主辦之《中大週刊》出版費每月 500 元。⁹⁴但隨著黨員人數日益增多，加之戰時物價飛漲，中央組織部所提供之經費已難以保障中大區黨部的正常運轉。到 1943 年時，中大區黨部的正常經費已提升到每月 600 元，但仍「極感支絀」，要求中央組織部將經費增至每月 1,200 元，⁹⁵但是否照准尚不得而知。一般來說，中大區分部的經費頗得中央組織部的照顧。1943 年 3 月，中大區黨部所請之特別補助費 2,000 元和宣傳中美、中英「新約」的補助費 550 元均得到批准。⁹⁶到 1944 年 4 月，中大區黨部請求中央組織部補助「黨務推動費」5,700 元，組織部全額照准。⁹⁷不過，中大區黨部的一些臨時性活動所需經費，有時也不一定能得到中央組織部的全額資助。如 1944 年 3 月，中大區黨部準備組織「憲政座談會」，請求補助 5,230 元，最後只得到中央組部 4,000 元的資助。⁹⁸1944 年底中大區黨部為「歡迎新同志」和「歡送從軍學生茶會」向組織部請求補助 10,000 元和 36,120 元，但最後只得到 4,500 元和 4,000 元的補助，兩者相差 38,620 元之鉅。⁹⁹

幾乎與國民黨直屬黨部進入中央大學同時，三青團也在中大校園內設立了直屬於中央團部的分團部。

紀錄未署明年份，但內稱出席該執行委員會會議的有徐仲年，查徐仲年只擔任過一屆區黨部執行委員（第三屆，時間在 1942 年 8 月後，1943 年 6 月前），可知該文件的年份為 1943 年。

⁹⁴ 「呈中央組織部（呈報經費收據由）」，〈中大檔〉，648(4)-310。

⁹⁵ 「呈組織部（鴻字第四四號）」，5 月 18 日（1943 年），〈中大檔〉，648(4)-310。

⁹⁶ 「第三屆執監委員第七次聯席會議紀錄」，1943 年 3 月 30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⁹⁷ 「彭耀崑簽呈（平渝 6757 號）」，1944 年 4 月 13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代電沙坪壩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平渝 6757 號）」，1944 年 4 月 26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⁹⁸ 「周鴻經呈中央組織部」，1944 年 3 月 26 日；「代電沙坪壩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平渝字第 5656 號）」，1944 年 4 月 8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⁹⁹ 「代電沙坪壩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區黨部（親渝 11150、11274 號）」，1944 年 12 月 18 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四、戰時中央大學的三青團組織及其活動

1938年7月16日，三民主義青年團（下文簡稱「三青團」）正式宣告成立。三青團是在國民黨形象欠佳、有失革命活力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組織，雖在人事構成和意識形態上與國民黨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或交叉關係，但在事實的組織活動和政治運作中卻保持完全的獨立性。¹⁰⁰

據黃堅立的研究，國民黨領導層創立三青團的初衷，並不是為瞭解決學生政治運動，在三青團成立的最初兩年中，三青團和學生運動一開始並無關聯。¹⁰¹1939年春，學校中的三青團組織開始建立。當時在各大中學校建立了19個直屬分團籌備處。1939年12月，中央大學的第四分團正式改組成立。各校分團指導員多由校長或「熱心團務」的教職員擔任，分團部主任多由在三青團有歷史的教職員擔任，書記多由學生擔任。¹⁰²此時，三青團中央大學直屬分團部指導員為法律系教授何義均，¹⁰³主任和書記的人選尚不明，校長羅家倫曾擔任分團部的「主任指導員」¹⁰⁴。

據三青團中央團部核心幹部康澤的回憶，中大分團的主任是學校教授中的復興社分子（三青團中央由黃埔系／復興社控制），中大分團部的成立由學校當局和原有的復興社分子共同推動成立。¹⁰⁵1941年5月25日，三青團中央大學分團部與重慶沙磁區各校三青團分團部在重慶大學禮堂正式成立，為表示重

¹⁰⁰ 參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一九四九）》（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00-108。

¹⁰¹ Huang Jianli,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Peter Lang AG, 1996), p. 143.

¹⁰²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周年紀念特刊》（重慶，1940），頁170。檔案顯示，國民黨中央在1938年12月前已決定「各大學均設青年團」，並要求各校將「願意參加之教職員名單」送達教育部。「教育部代電（密，13940號）」，1938年12月8日，〈中大檔〉，648-2251。

¹⁰³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頁205。

¹⁰⁴ 〈本校各團體歡送羅校長〉，《中大週刊》，期13（1941年8月13日），第2版。

¹⁰⁵ 康澤，〈康澤自述（五）〉，《傳記文學》，卷68期1（1996年1月），頁105。

視，三青團中央書記長張治中親臨主持成立典禮。¹⁰⁶

1939年7月，即三青團成立一年後，團員總數僅為5萬人。陪都重慶內遷的高校甚多，但團員人數只有一千餘人。到該年底，在總數將近9萬人的團員中，學生比例僅為8.1%。隨著學校團務的不斷推進，入團的學生人數逐年激增，到1940年時已增至3.55萬人（佔團員總數13.7%），到1946年時，達到61.5萬人（佔團員總數的46%）。¹⁰⁷戰時中央大學內三青團組織人數的發展亦呈現這一趨勢。據載，當1941年7月羅家倫辭去中大校長時，沙坪壩校本部全體團員出席了中大三青團分部舉辦的惜別大會，當時有一百餘人。¹⁰⁸到1944年3月統計時，中大沙坪壩本部、柏溪分校及附屬團隊的三青團員已到達509名。¹⁰⁹1943年2月，柏溪分校有三青團員三百多人，已佔全體學生的25%以上。¹¹⁰1944年10月，三青團中大分團部為召開團員大會，需借用學校大禮堂，此時團員數已多達800人。¹¹¹而1944年上半年時，中大的國民黨員人數達六百餘人，團員數應超過黨員數。

三青團中大分團部的組織架構，除了在1941年前分團部「正式」成立之前所設的指導員、主任和書記外，在其後的歲月中，中大分團部的領導機構一般為幹事會和監察會。現以「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分團部負責人」（收入〈中大檔〉648-2249）為例。¹¹²從刊載內容看，中大分團部幹事長為法

¹⁰⁶ 〈沙磁區三青團各分團奉命正式成立〉，《中大週刊》，期8（1941年6月2日），第3版。

¹⁰⁷ 中央團部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頁158-159，轉引自馬烈，〈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統區學生運動〉，《民國檔案》，2003年第3期，頁81-82。

¹⁰⁸ 〈本校各團體歡送羅校長〉，《中大週刊》，期13（1941年8月13日），第2版。

¹⁰⁹ 何開鈺，〈中大分團鳥瞰〉，《沙磁文化月刊》，卷2期8（1943年3月），頁5。據1943年2月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央大學內三青團員人數為314人。（「本校青年團團員各院人數」，1943年2月26日，〈中大檔〉，648(4)-316）該檔為手寫，也不是正式報告材料，而且所統計的材料有可能僅限沙坪壩校本部。

¹¹⁰ 〈柏溪分校〉，《國立中央大學校刊》，期3（1944年2月1日），頁4。

¹¹¹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國立中央大學分團部公函（中大幹字第306號）」，1944年10月16日，〈中大檔〉，648(4)-316。

¹¹² 按該檔未表明具體年月。根據文中顯示，當時分團部宣傳幹事高家佑和宣傳股長唐繼明均為法律系三年級學生。查中大相關學生名錄，該二生為法律系三三級學生，1945年6月畢業（參見《國立中央大學三三級畢業同學錄》，〔重慶中央大學〕三三級級會編印，鉛印本，1945年6月，頁9-10），就讀三年級的時間應在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因此可以大體斷

律系主任何義均，在組建時期就是中大分團的指導員；書記為政治系四年級學生繆聲新；幹事會設幹事 5 人、候補幹事 3 人，各股股長 6 人，俱樂部和中正室總幹事各 1 人，均為學生；常務監察（委員）為法學院經濟系主任吳幹，監察（委員）為師範學院心理系教授王書林和師範學院公民訓育系助教周興定，候補監察（委員）為工學院航空系助教宋懿昌。不管是學生還是教師團員，法學院和師範學院的師生佔據了其中的絕大多數。

王良卿認為，三青團在形式上始終徘徊於青年組織與政治團體之間，其性質始終模糊難辨。¹¹³若是作為一種青年組織，三青團的主要職能就體現在組織和「訓練」青年上。除卻在校內擴充政治力量、進行政治動員並與中共學生組織鬥爭外，三青團中央大學分團部的「青年組織」功能一般體現在一些社會服務活動方面。如創辦中央青年俱樂部（設小食部、社交室、遊藝室、代辦部等）、柏溪青年服務社、民眾學校和警工學校（招收學校附近失學兒童和向學校警工授課）、小龍坎青年服務社以及在新生入學時從事服務工作。宣傳工作有刊行壁報，宣揚三青團的政治理念等。¹¹⁴三青團中大分團部創辦的壁報是《青年》和《青年週報》。¹¹⁵當然，以上這些活動的目的仍是政治性的，是為「樹立團的社會基礎，擴充組訓之內涵」。¹¹⁶

不過，在當時一些普通同學的心目中，對中大校內三青團的服務性工作並沒有特別的印象，而且對於三青團的組織和個人多持鄙夷之眼光。從 1944 年 1 月開始，就讀於重慶中央大學經濟系的蕭承齡先生談及他當時對校內三青團的觀感：

三青團在中大是合法的，而且是公開的，團員不是秘密的，但至少是為人所不齒的，他們不大願意公開身分。三青團在中大有支部，也有公開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們活動的時候很少以三青團出面，他們的活動可以

定，上述檔的時間應介於 1943 年下半年到 1944 年上半年之間。

¹¹³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頁 3。

¹¹⁴ 何開鈺，〈中大分團鳥瞰〉，《沙磁文化月刊》，卷 2 期 8，頁 5。

¹¹⁵ 夢君，〈壁報在中央大學〉，《中國青年》（重慶），卷 10 期 6（1944 年 7 月 15 日），頁 63。

¹¹⁶ 何開鈺，〈中大分團鳥瞰〉，《沙磁文化月刊》，卷 2 期 8，頁 5。

說是半公開的，不以（三青團的名義）大力宣傳。我連公開發展三青團員的事情都沒有碰到過。¹¹⁷

蕭老當時對三青團的這種印象，實屬普遍。就連三青團中央團部在檢討工作得失時也注意到，三青團的「革命鬥爭工作」有所「隱晦」，希望以後的鬥爭方式「必須公開坦白正大光明」，而且承認大部份青年對於三青團「徘徊觀望，不能踴躍加入」。¹¹⁸

綜言之，在中央大學校內，一方面三青團人數激增和各項工作迅速推進；¹¹⁹而另一方面，三青團組織和普通同學之間的鴻溝卻日益加深，團員和非團員在政治和人事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區隔。浙大校長竺可楨對於在學校中設立三青團組織的最大擔憂，就是「以後使學生分爲團員與非團員」，¹²⁰而他在中央大學所見聞的正是自該校組織三青團後，校長羅家倫「對於畢業學生之升任助教等事以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爲依歸，故學生乃分爲團員與非團員二派矣」。¹²¹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和三青團均將組織發展和政治動員的重點放在學校和青年學生之中，在學校中設立直屬於中央的區黨部和分團部成爲戰時校園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徵，而中央大學和中大學生恰好是黨團共同注目和爭取的目標。

總體而言，由於國民黨內 CC 系與黃埔系 / 復興社一貫以來的派系之爭，以及戰時國民黨和三青團奪取政治資源的競爭，黨團關係在中央和地方均極其緊張，黨、政、團三方關係也日趨複雜。抗戰時期學校內部黨團關係之「真相」至今仍模糊不清。據王奇生的研究，在西南聯大，國民黨與三青團的關係融洽而非頹頹；但也有學校黨、團衝突極爲激烈，如西北大學。¹²²具體到中央大學，

¹¹⁷ 「蕭承齡先生採訪紀錄」，南京市秦淮區，2007年1月2日。

¹¹⁸ 中央幹事會秘書處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七年來團務工作報告（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三十三年十二月）》，頁260-268。

¹¹⁹ 與其他學校的三青團分團部工作相比較，中央大學「成績較優」。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1941），頁105。

¹²⁰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卷6，日記，1939年9月4日，頁154。

¹²¹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卷6，日記，1939年9月26日，頁170。

¹²²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爲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31-132。

曾任學校訓導長的郭廷以回憶，在顧毓琇出任校長時期，學校內「有黨（國民黨）團（青年團）內爭，相當複雜」，¹²³但他對具體的矛盾卻沒有更深入的解釋，亦無其他相關材料，故本文對此問題尚無法置論。

胡國台認為，戰時國民黨在高校建立黨部和三青團是爲了阻止中共擴張勢力。而王奇生並不完全贊同這一觀點，認爲最初籌設大學黨部，國民黨黨內的派系組織競爭是更爲直接的動因。¹²⁴不過，不管大學內黨部籌設的初衷如何，區黨部和分團部之間的關係怎樣，兩者的主要政治活動無疑都是針對一個共同的對手——校內的中共黨組織及其領導的外圍學生團體。

五、戰時中共組織活動的限制

與國民黨區黨部和三青團分團部相比，中共在中央大學內的組織系統具有一貫性和延續性。在中大內遷後，校內的中共組織重建也要早於國民黨直屬區黨部和三青團分團部的設立。

1923年10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將南京的東南大學和建鄴大學的師生黨員編爲第6小組。此後，東南大學的中共組織和活動持續發展。1927年1月，東南大學和金陵大學黨員共15人，組建南京地委下轄的第11支部。1927年3月後，南京市的中共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學生黨員星散。¹²⁵1927年10月中共南京市委成立，翌年初設第四中山大學支部。此後，中共南京市委幾次遭到破壞，復又重建，直到1934年8月徹底被根除。期間，中央大學的中共支部也屢遭破壞，黨員不超過5名，亦無特別明顯的政治活動。¹²⁶

¹²³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等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209。

¹²⁴ Hu 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June 1989), p. 309;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爲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29。

¹²⁵ 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6-11。

¹²⁶ 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南京

1937年10月，中央大學內遷到重慶沙坪壩。與此同時，重慶中共地下黨組織也開始重建。1938年四五月間，中共在內遷後的中大成立第一屆黨支部，受中共川東特委和沙磁區委的雙重領導。從1938年4月到8月，中大先後成立四屆黨支部，共有黨員16人。1938年10月中大柏溪分校成立，一個月後，中共就成立了柏溪分校黨支部，共有黨員12人。1940年暑假後，中共中央大學黨總支委員會成立，下設中大新、老支部和柏溪分校支部。¹²⁷

抗戰爆發初期，由於第二次合作關係的確立和抗戰形勢的發展，國共兩黨關係相對融洽，這種良好的關係一直持續到1938年底。¹²⁸在中共的組織發展史上，中共在重慶地區的組織力量向來不夠強大，但抗戰爆發後，中共組織在重慶活動的合法化，為這一地區的中共組織發展提供了絕佳的契機。

據國民黨方面的觀察，自1938年底國民政府棄守武漢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吳玉章、陳紹禹、秦邦憲、董必武、林祖涵、鄧穎超等相繼來渝，以重慶為中共中央發號施令之所在地，工作豈可落後，乃積極進行，來〔按，衍字〕組織、訓練、宣傳同時並進，尤側重新黨員之吸收與青年民眾之抓取。」在此時，中共在重慶已有相當大的政治力量，而「共產黨實力以學校為最厚」。憲兵第三團調查到，中央大學「加入共黨者有化學教授袁翰書¹²⁹及學生蔡若水、勇龍桂、嚴裕讓……等十八人，由蔡若水負主責，組有中大自治會、中大劇團、嘉陵歌詠隊。」此外，重慶地區的許多學校和文化機構、社會團體均有中共背景，教育文化界的整體左傾氛圍已相當濃厚。但國民黨方面對中共和左派團體的活動，此時因「礙於正面之衝突」，只是「作消極之防止」。¹³⁰總之，與戰前相比，抗戰初期中央大學內的中共組織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也並未受到國民

市組織史料(1922-1987)》(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頁35-45。

¹²⁷ 參見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頁27-30。

¹²⁸ 參見楊奎松，〈論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關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120-146。

¹²⁹ 應為「袁翰青」，見〈國立中央大學各學院院長系科主任教授講師助教一覽(二十六年度上學期)〉(教務處註冊組編製，油印本，時間不詳)。

¹³⁰ 〈憲兵第三團團長袁家佩呈蔣委員長《共產黨及人民陣線活動調查報告》一份(1938年12月)〉，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四)，頁74-84。

黨的特別阻礙。

此外，抗戰初期中央大學校園內的左翼政治氛圍也比較濃厚。當時中大校內的中共外圍團體「中大文學會」的負責人徐中玉回憶，他當時請過老舍、胡風和郭沫若等左翼文化名人到校講演。¹³¹而且，中共領導人也曾公開出入於中大校園內。據許多中大的中共和左派學生回憶，周恩來曾在 1938 年底或 1939 年初在中大飯廳講演，一時轟動。而且，當時周來中大時，由中大教務長童冠賢親自迎接，演講會由國民黨「老黨務」中大法學院院長馬洗繁主持。¹³²由是觀之，周恩來赴國民政府陪都「最高學府」演講極具政治象徵意義，體現了當時國共合作的政治態勢。在此時國共關係的大背景下，中大校園內的政治氣氛還算得上比較寬鬆，表面上的國共對立也並不嚴重。有人回憶，在周恩來報告會之後，「很多學聯（即成立於 1936 年 8 月的「南京秘密學聯」，抗戰爆發後又在沙坪壩各校發展組織力量，接受中共領導）積極分子表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¹³³

正如前文所引憲兵第三團調查報告所稱，直到 1938 年底，在中央大學校內由中共地下黨控制了學生自治會等學生組織。1937 年中央大學內遷時，南京秘密學聯成員十餘人就先期到達，成立入川同學服務團，與國民黨 CC 系和復興社負責人磋商後，成立了學生自治會幹事會，實權由秘密學聯成員掌握，國民黨方面的學生也在幹事會中取得了一定地位。¹³⁴相較而言，在中大校園內的學生活動中，中共及左翼外圍組織明顯佔優勢。

但隨著國民黨、三青團在學校中的組織推進和國共兩黨關係的逐漸惡化，

¹³¹ 徐中玉，〈半世紀前在沙坪壩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會重慶市沙坪壩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懷沙坪 憶當年（續集）》（重慶：出版者不詳，1991），頁 60。

¹³² 陶大鏞，〈難忘的沙坪壩歲月〉，收入高澍主編，《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87-189；黃大明（文澍），〈重慶中大建黨鬥爭的回憶〉，收入《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186；陳以震，〈沙坪偶憶〉，收入《懷沙坪 憶當年（續集）》，頁 175。

¹³³ 黃大明（文澍），〈重慶中大建黨鬥爭的回憶〉，收入《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186。

¹³⁴ 參見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28。

中央大學內的中共組織和受其領導或影響的學生團體開始遭到極大的限制。首先是中共和左翼學生控制的學生自治會權力易勢。1939年5月，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奉蔣介石諭，向中央大學下達訓令：「中大學生自治會為共黨把持，應予查明，設法改組。」¹³⁵三天之後，校長羅家倫立即召開各院系代表大會，對學生自治會進行了徹底改組，國民黨和三青團學生掌握了自治會的控制權。¹³⁶緊接著，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救亡工作團「既非依法組織，亦非學校特許」，也被學校當局取締。¹³⁷

1939年7月，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對中央大學內的左翼文化團體進行調查，「中大文學會」和「中蘇問題研究會」的活動引起了他們的警惕。社會部將調查報告致函教育部，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又立刻致函中大校長羅家倫，請他對該組織嚴加防範。¹³⁸國民黨對中大「中大文學會」和「中蘇問題研究會」組織活動的基本情況已掌握得十分具體，但對這兩個團體與中共地下黨之間的關係還不是特別明瞭。當時「中蘇問題研究會」的負責人是經濟系學生陶大鏞，他曾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團」，並且擔任過團長，在1939年春加入中共。中共組織讓陶大鏞負責「中蘇問題研究會」，該會是中共地下黨的週邊組織，「中大文學會」亦為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1940年初，因形勢嚴峻，「中蘇問題研究會」主動停止了活動。¹³⁹

上文所引檔案內容顯示，中央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和救亡工作團等有中共背景的组织，引起國民黨中央的關注後，才被學校勒令改組或取締。這多少已反

¹³⁵ 「朱家驊致羅家倫」，5月25日（1939年），〈中大檔〉，648-3605。按原函未署年份，查朱家驊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時間為1938年4月到1939年11月，上文已述，直到1938年底，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仍由中共和左翼學生主導，故該函的年份應為1939年。

¹³⁶ 「羅家倫復朱秘書長函」，〈中大檔〉，648-3605。

¹³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公函（治運巴字第245號）」，1939年6月24日，〈中大檔〉，648-3586。

¹³⁸ 〈國民黨中央社會部為調查防範中央大學「左傾」文化團體與教育部往來密函（1939年7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5輯第2編，文化（二），頁206-208；〈教育部要求中大嚴防左傾團體蔓延函〉，收入《南大百年實錄》，上卷，頁473-475。

¹³⁹ 陶大鏞，〈難忘的沙坪壩歲月〉，收入《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頁188-190。

映出此時中大校園內的政治氛圍受到了「黨國」意識形態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愈益加深。中共組織在中大校園內的活動也開始面臨更為嚴峻的形勢，校方以及國民黨和三青團對於中共組織和活動的打擊，使其不得不由公開走向秘密。

大致而言，從 1940 年起，由於國共關係趨於惡化，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策略重新進行調整。1940 年 6 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說：「今後在國民黨區學生運動的根本方針，應是長期的潛伏發展，積蓄力量，爭取人心」，工作中心「應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轉為校內學生工作」。¹⁴⁰重慶的南方局貫徹中央的決定，在青年工作的組織上實現「公開暴露」到「隱蔽精幹」的轉變。¹⁴¹

中央大學內的中共黨組織從 1939 年底起已開始注意隱蔽工作，將一部份學生黨員轉移到延安。1939 年 10 月，中大「老支部」書記黃大明和黨員蔣寧離開重慶赴延安。¹⁴²1940 年初，中大的中共黨員馮秀藻被捕，石山、陳元暉和周壽臧等人也轉移去延安。¹⁴³

1941 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國共關係降至谷底，國民黨區域內的大部份中共黨員開始撤離或隱蔽。重慶沙磁區的一二百名黨員奉命轉移隱蔽。到 1941 年春，中大內的三個中共支部只留下十餘名黨員。而到 1942 年和 1943 年，中央大學只剩下少數幾個黨員，校內的中共組織不復存在，黨員的組織關係在南方局或重慶市和所屬縣，與黨組織負責人實行單線聯繫。一直到抗戰勝利時，中央大學內仍沒有建立正式的中共黨組織。¹⁴⁴1942 年 3 月，國民黨重

¹⁴⁰ 〈中央關於目前國民黨區學生工作的幾個決定（1940 年 6 月 3 日）〉，收入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檔選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頁 519。

¹⁴¹ 〈南方局領導下的青年工作〉，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 433。

¹⁴² 黃大明（文澍），〈重慶中大建黨鬥爭的回憶〉，收入《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187。

¹⁴³ 陶大鏞，〈難忘的沙坪壩歲月〉，收入《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頁 190。

¹⁴⁴ 參見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31-44。

慶市黨部所掌握的沙磁區中共活動情報稱：

沙磁區學校林立，工廠亦多，自二十七〔1938〕年以來奸黨〔即中共——引者注〕即極為活躍，並專派幹部指導活動，鼓勵罷工或煽動學潮，不□〔擇〕手段以遂其挑撥離間肆意搗亂之陰謀，故各校得有奸黨組織存在。計中央大學有屈德先與張德仁、苗淑英等三十餘人，重慶大學有呂總滔、王綱英等二十餘人，中央工校有韋美謙、唐敬之等十餘人，教育學院有姚銘等，皆為沙磁區學校最活動之奸黨份子。三十〔1941〕年春季經各方制裁，□積極制裁，似較消沉，然潛伏之勢力依然存在。¹⁴⁵

此調查報告的內容基本反映了「皖南事變」前後重慶沙磁區各校中共組織活動變化的大體趨向，其中「潛伏之勢力依然存在」一語，的確也道出了是時中共組織在嚴酷的鬥爭形勢下仍然「野火燒不盡」之情勢。「皖南事變」後，雖然中大校園內的中共黨員人數劇減，支部組織最後也取消，但從1942年起，中共南方局開始在校內設立無固定名稱和章程的積極分子秘密組織——「據點」，且「較鞏固」。¹⁴⁶到1944年底，中大「據點」的核心成員和基本成員共有百人左右（絕大部份非中共正式黨員）。¹⁴⁷

對比之下，在「皖南事變」發生後一直到抗戰勝利的這段時間內，正值中央大學國民黨區黨部和三青團分團部迅速推進組織發展，校園內的政治性學生活動基本被黨團所控制。¹⁴⁸由於中大內中共組織的解散和學校內國民黨勢力的牽制，校內的國共之爭已經很難形成「組織對組織」的態勢，在一般情況下均是個別的中共和左翼學生應對學校當局和校內黨團的整體圍攻。例如，在此時的中大學生自治會中，中共學生已難廁身，更無法發揮組織的力量。1942年2

¹⁴⁵ 「教育部代電（第281號）附『沙磁區奸黨份子活動情形』抄發原件」，1942年3月31日，〈中大檔〉，648-3581。

¹⁴⁶ 〈南方局青年組1942年工作報告（摘要）〉，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頁92。

¹⁴⁷ 參見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頁31。

¹⁴⁸ 抗戰時期，學校三青團的工作中心主要是「掌握學生會組織，建立學術團體，以為組織之週邊，並協助學校當局，防止並解決學潮」，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中共的學生運動而言。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會工作報告（三十三年四月至三十四年）》（1946），頁62。

月，國民黨中央作出明確規定，雖然「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在形式上應由學校當局指導」，但「學校黨部應指導黨員團員，運用黨團力量」從事學生自治會的實際活動。¹⁴⁹1943年1月的中大學生自治會改選，當選結果是「除一二例外，餘均為三青團」。¹⁵⁰1944年3月，國民黨中大區黨部在呈中央組織部的報告中更明確指出，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在本黨劉兆田等同志領導下，最近即將遵照教育部頒發之學生自治會組織綱要改組」。¹⁵¹據劉兆田本人回憶，當時學生會選舉，以幾位法學院同學為主組成「某社」，參加者「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有組織、有準備的來競選」，在系科代表大會中選舉獲勝，最後當選。¹⁵²

同時，中共黨員秘密活動的開展也殊為不易，中大校園內中共學生的秘密活動多被國民黨監視。1942年，中大中共黨員張學禮被捕，其他黨員劉明章、陳季子、陳細兒和劉文書等人，在沙坪壩購銷處召開秘密會議的情報即迅速被國民黨方面掌握。¹⁵³

1944年底，轟動中央大學校園內外一時的「救亡會事件」足可體現當時校內國共（或「左右」）鬥爭雙方力量對比的大體情勢。當時有人在呈送教育部的密報中稱：1944年12月2日，「奸偽份子王家祥、曾慶冠等發起成立」的「中央大學學生救亡會」在101教室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學生二百餘人，在教室四周旁聽者亦有百餘人。陳宏萬為大會主席，宣布該會主張。當時，「有多數學生不願聽其論」，就大聲喊打，陳宏萬即被一學生「拖出會場毒打」，

¹⁴⁹ 〈釋示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之指導事宜疑義〉，《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4期4（1942年2月16日），頁20。

¹⁵⁰ 〈沙磁點滴〉，《新華日報》（重慶），1943年1月4日，第3版。楚崧秋回憶他在大四學年（1942-1943）擔任三青團中央大學分團部的佐理書記，並被選為該年學生自治會主席。但「比較接近的同學私下告訴我，雖然你是青年團員，大家選你是因為少有黨團氣味」。見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26。

¹⁵¹ 「中央大學區黨部呈文（中經字第121號）」，1944年3月31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¹⁵² 劉兆田，〈大學生活——兩張舊照片往事上心頭〉，《中外雜誌》，卷29期1（1981年1月），頁33。

¹⁵³ 「教育部訓令（密字305號）」，1942年4月11日，〈中大檔〉，648-3620。

王家祥則被捉獲送往訓導處。翌日，「即有學生一百餘人簽名布告主持正義，要求學校嚴辦救亡會會員」。¹⁵⁴不過，「中大救亡會」的參加者絕大部份不是中共黨員。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人員彭耀昆親赴中大調查的結果表明，在「中大救亡會」的發起者王家祥、陳宏萬、曾慶冠和鐘英等十一人中，僅王家祥為中共黨員。¹⁵⁵在鐘英的回憶文章中，雖未指明王家祥之名，但他自己在當時的確還沒有加入中共。¹⁵⁶從中也可發現當時中共組織在校內的實力還很有限。¹⁵⁷

在中大救亡會召開成立大會的前一天，國民黨區黨部早已有了應對的準備，第二天與大會發起者進行「武鬥」的學生正是校內的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¹⁵⁸

在這次中大校園內的左右正面交鋒中，以國民黨三青團「武鬥」的全面勝利而告終，嗣後國民黨和校方並且做了嚴密防範，事態也並未擴大。1945年4月，蔣介石在三青團第一屆三中全會上就明言：「我們現階段和共產黨的鬥爭，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不是高談理論所能奏效的」，而且以後國共鬥爭的主戰場在「就是各地的學校」。¹⁵⁹「中大救亡會」事件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為蔣介石的國共「鬥爭理論」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從整個抗戰時期中央大學校內的國共鬥爭歷史來看，中共的組織發展和動員力量基本處於下風。特別在1941年之後，中共和左翼學生在校內再無特別明顯的活動，且時時被置於對手的圍攻和監視之中。¹⁶⁰不過，隨著戰後中國政

¹⁵⁴ 〈鄭忠華為破壞中央大學學生組織救亡會進行愛國活動的有關密報（1944年12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輯第2編，政治（五），頁251-252。

¹⁵⁵ 彭耀昆，〈赴中央大學調查「中大學生救亡會」事件報告〉，1944年12月7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¹⁵⁶ 鐘英，〈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我的入黨前後〉，收入《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頁202-205。

¹⁵⁷ 中共在中央大學內的「據點」對「救亡會」事件有專門的檢討，認為是「據點」在校內所聯繫的「朋友」未能一致行動，導致了救亡會的失敗。參見吳佩綸，〈中央大學據點報告（1945年初）〉，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頁166。

¹⁵⁸ 彭耀昆，〈赴中央大學調查「中大學生救亡會」事件報告〉，1944年12月7日，〈中央組織部檔〉，717(4)-1062。

¹⁵⁹ 蔣介石，〈本團一屆三中全會團長開幕訓詞（1945年4月20日）〉，收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重慶：編者自刊，1946），上編，頁201-203。

¹⁶⁰ 中共方面認為在中央大學內開展工作的一大困難就是「三青團、國民黨在這裏思想上的統治力

局發生的新變化，中共在校內埋藏的「革命種子」又逢新的萌發土壤。

六、戰後學校國民黨黨團組織形態演變與中大黨團組織

1945年5月18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作為「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的準備措施，規定「各級學校內不設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改屬於政府，擔任訓練青年之任務」。¹⁶¹據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云：自「六全大會」決議案公布後，「學校黨務經費發至十二月（1945年）止，各項活動亦早經停止」。¹⁶²

根據以上材料，王奇生在沒有經過充分「證無」的情況下得出結論：戰後全國各區黨部相繼關閉，因此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組織在大學校園內日趨活躍，兩黨在校園的局勢迅速發生逆轉；且因校園內的區黨部不存，國民黨只能直接藉軍警力量震懾學潮。¹⁶³但事實上，戰後大學校園內國民黨組織的情況遠比王的推論要複雜得多，學校三青團的情況亦有待深入考察。

國民黨六全大會公布撤銷學校區黨部的決議後，1945年6月9日，中央組織部即對此案進行操作性討論，得出兩項辦法：「一、本黨在各學校中特設之黨部應於七月底前撤銷，二、學校黨員應向黨部報到編入組織。」¹⁶⁴若這兩項辦法得以施行，學校內的國民黨組織將回復到戰前狀態，即學校黨員編入地方黨部，學校黨部不再直屬於中央組織部。7月4日，教育部召集有關方面召開訓育會議，十天之後作出「學校黨部撤銷團部改隸後黨團工作之改進辦法」

量也特別大」。參見吳佩綸，〈中央大學據點報告（1945年初）〉，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頁164。

¹⁶¹ 〈促進憲政實施之各種必要措施案（1945年5月18日）〉，收入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下冊，頁932。

¹⁶²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頁569。

¹⁶³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43。

¹⁶⁴ 「關於軍隊黨部學校黨部撤銷問題小組會議紀錄」，1945年6月9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6.3/5.3-5。

的決議：「一、黨員仍不應放棄其個人工作，二、團的中心訓練應注重科學研究、體育活動及勞動服務等項，三、徵求團員應嚴格，使能起模範作用。」¹⁶⁵而教育部進行的學校訓育工作，校內的黨團員仍將是應對學潮的倚重力量。所以第三項辦法後曾注明：「俟團部改隸辦法決定後，再訂青年團與訓導處之工作聯繫辦法。」但事實情況是，直到 1948 年「黨團合併」，三青團從未「隸屬政府」。

1947 年 9 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實行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統一（「黨團合併」），並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增設青年部，為國民黨領導及組訓青年之機構。¹⁶⁶為此，蔣介石指示：「各學校團部，在最近期間，不宜有所變動，應全部受青年部之指揮，保持其原有之力量。」¹⁶⁷換言之，各校三青團組織並未因為黨團合併而立即取消，三青團系統的業務職能由國民黨中央青年部替代。據〈黨團統一組織期間學校團隊組織過渡辦法草案〉規定，黨團合併，在未舉辦黨員重新宣誓以前，各學校團隊仍保持原有組織，改由擴增改組之後的各地黨部黨團統一委員會監督指導。¹⁶⁸

黨團合併之後，由國民黨中央設青年部主持學運諸事宜。與此同時，由於各大城市學潮頻仍，為了尋求對策，1947 年 10 月教育部長朱家驊和青年部長陳雪屏共同制定〈防止學潮辦法草案〉，認為各地學校黨部和團部應「暫維原狀」，京滬平津等重要據點團部應行改組，青年部組織「學運小組」分駐各重要據點，「專負各地學校團隊之聯絡與指揮」。¹⁶⁹青年部於 1947 年 11 月 7 日簽呈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請示「今後學校之內是否成立黨部，抑僅成立外圍團體，

¹⁶⁵ 「防止奸偽學生組織學生聯合會案」，1945 年 7 月 14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 3/7.2。

¹⁶⁶ 〈統一中央黨部團部組織案（1947 年 9 月 12 日通過）〉，收入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 1170-1171。

¹⁶⁷ 〈國民黨中常會第八十四次會議紀錄（1947 年 9 月 24 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台北：編者自刊，1954，鉛印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頁 497。

¹⁶⁸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八月）》（出版者不詳，鉛印本，1947，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頁 76。

¹⁶⁹ 「朱家驊陳雪屏呈蔣中正防止學潮辦法草案」，1947 年 10 月 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革命文獻·戡亂軍事〉，冊號 14，目次號 20。

不設學校黨部？」蔣批示：學校黨部「應秘密方式設置為宜，絕不公開」。¹⁷⁰

1948年3月，中央組織部和青年部協商黨團合併之後學校團隊編入黨部，得出關於學校黨務組織的三套方案。最後決定採取折中辦法，推行第三套方案，以「黨團同志會」的形式繼續校內黨務活動，採秘密方式。¹⁷¹之後，青年部又制定〈中國國民黨學校黨員組織暫行辦法草案〉，規定學校黨員組織暫稱為「黨團同志會」，絕對秘密，對外不公開；專科以上學校的黨團同志會相當於縣黨部，屬於中等學校及邊疆小學者相當於區黨部；黨團同志會設幹事會，由小組長會議選出幹事會5人至11人，候補幹事1至3人組成，並互推1人為常務幹事。¹⁷²

以上所稱「青年運動委員會」係黨團合併之後，各省市設青年運動委員會「承中央青年部之指導及各該省（市）執行委員會之命令，主持各該省（市）青年運動工作」。¹⁷³從組織關係看，各省市青年運動委員會相當於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的地方派出機構，同時受地方黨部領導。

中央黨團統一委員會不久後正式通過《中國國民黨學校黨部組織暫行辦法》。與先前的草案相比，學校國民黨組織仍為「黨部」，但不冠以學校名稱，組織對外絕對不公開；學校黨部「屬於專科以上學校者為直屬區黨部，屬於中等及邊疆小學者為直屬區分部，分別隸屬於各級青年運動委員會」；學校黨部設指導員若干人，由當地青運會從各校教職員中選任負責指導黨部工作。1948年8月，國民黨中常會第160次會議修正《暫行辦法》，將學校黨「劃屬地方黨部管轄」，「並受各級青運會工作之指導」。¹⁷⁴

¹⁷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公函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1948年3月10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25/4.8.111。

¹⁷¹ 「學校黨務組織參考資料述要」，1948年3月9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25/4.112。

¹⁷²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青年部公函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含附件）」，1948年3月10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25/4.8.111。

¹⁷³ 〈省（市）青年運動委員會組織規程（三十七年元月二十一日第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三七次會議通過）〉，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頁670。

¹⁷⁴ 「六屆中常會第160次會議紀錄」，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紀錄檔案〉，6.3/162.1。

據戰後國民黨中央關於學校黨務的各項規定，可斷定國民黨六全大會關於「取消學校黨部」的組織並未落實。從 1945 年底至 1948 年 8 月，各校國民黨組織基本保持原狀，而國民黨第 137 和 160 兩次中常會的決議，確立了各級學校黨部隸屬地方黨部的格局，原本「中央直屬」的學校黨部不復設。不過，撤銷學校黨部乃「憲政」的配合措施。由於黨團合併以及「制憲國大」（1947 年 11 月 15 日）的召開，學校黨部在法理上已無存在的依據。如 1947 年底，中央青年部部長陳雪屏宣稱：「國民黨在校中並不設立黨部，其他黨派之學生亦不應借學校之庇護，而有政治活動。」¹⁷⁵因此，「秘密」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成爲學校黨部繼續存在的前提。

蓋因「組織絕對秘密」的關係，關於戰後中央大學校內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形態，已刊資料以及南京、台北兩地檔案館的相關資料付之闕如。以下幾條材料或能從側面瞭解一些情況。黨團合併後，國民黨中央成立青年部。1947 年 10 月，中央青年部爲「重新確立今後學校黨務方針」，召集首都各專科以上學校訓導長和三青團分團部負責人參加黨務座談會。¹⁷⁶其中，中大受邀者爲訓導長沙學俊和三青團直屬中大分團幹事長何義均、分團書記何修義。¹⁷⁷分析這則材料，估計當時中央大學的黨務直接由訓導長主持，團務系統則保持不變（何義均從抗戰時期起即爲中大三青團組織的負責人，見前文）。

1943 年 3 月至 4 月，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決定各專科以上學校分團直屬中央團部。1946 年 9 月，三青團第二次全國大會又決定將學校團部重新改隸所在地的地方支團，於 1947 年 6 月實施完成。但因中大地處首都，故中大分團部暫緩改隸，仍與中央團部保持隸屬關係。¹⁷⁸南京市檔案館存有一份抗戰勝利後中央大學三青團員名冊，總計人數爲 230 人，加之 1947 年

¹⁷⁵ 〈青年部將在華北平津成立青運指委會〉，《世界日報》（北平），1947 年 12 月 16 日，〈1940 年代中央社剪報資料〉，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

¹⁷⁶ 「黃季仁上陳雪屏等簽呈」，1947 年 10 月 13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 24/3.48。

¹⁷⁷ 「中青部長陳雪屏致沙學俊等函」，1947 年 10 月 18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 24/3.41；
「中青部致陳汝霖等函」，1947 年 10 月 18 日，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 24/3.42。

¹⁷⁸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八月）》，頁 83。

8月2日補行總甄後的團員23人，共253人。¹⁷⁹較之1944年的800多名團員（前文），¹⁸⁰1947年中大的三青團員人數已大幅下降。中大內三青團員人數減少實則是普遍現象，到1947年時全國入團的學生只佔總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如同濟大學在1938和1939年間有二分之一學生入三青團，而1947年只有十分之一。¹⁸¹

雖然1947年底實行黨團合併，三青團中央組織系統隨之併入國民黨中央。然而，由於地方層級的黨團隔膜甚至是矛盾長期存在，難以在短時間彌合，所以許多地方直到1949年仍未辦妥黨員團員重新登記，黨團並未真正統一。¹⁸²而在學校層級，由於「應對學潮」的需要，三青團組織可能一直延續到1949年初。1948年11月，南京市舉辦「學校黨務幹部講習會」，徵調各校相關人員受訓，包括各校的「支區分（團）部之負責人」、「支分（團）部各主管業務之幹部」以及「支分（團）部所屬各學校小組（分隊）組長（分隊長）」等，其中中央大學的名額為20人。¹⁸³

七、戰後中央大學內的國共鬥爭

前文已述，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中央大學校內的中共黨組織撤銷，黨員人數也急劇下降，只有個位數的學生黨員潛伏工作。但從1942年起，中共中央南方局開始在校內設立無固定名稱和章程的積極分子秘密組織——「據點」，作為黨的外圍組織和基礎力量。在「據點」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新民

¹⁷⁹ 〈中央大學三青團抗戰勝利後的名冊〉，南京市檔案館藏，〈三青團中央團部南京支團檔案〉1037-1-147。

¹⁸⁰ 南京市檔案館存有一本殘破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大分團團員統計表〉（毛筆手寫本），從尚能辨識的名單看，有團員812人，其中教授有江康黎、許恪士和繆鳳林等人，實際總數定超過此數，時間估計為1946年。檔號：1037-1-145。

¹⁸¹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冊8，1947年9月10日、1947年11月3日，頁480、501。

¹⁸² 詳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頁362-365。

¹⁸³ 「南京市學校黨務幹部講習會受訓調集辦法」，1948年11月，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特24/3.16。

主義青年社」（「新青社」），由左傾學生和零散的黨員組成。1945年8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批准成立新青社。¹⁸⁴

1946年1月10日，由國共兩黨及其他中間黨派團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同時，英國準備在香港新界的屏山修建機場，法國輪船白爾丁號在上海運送漢奸。1月25日，以中央大學為首的重慶大中學生發動了聯合請願遊行（「一二五運動」），要求政協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並反對英、法侵犯主權的行徑。這場運動以和平方式展開，於當天結束。參加此次請願運動的大中學生共有一萬人左右。¹⁸⁵在這場遊行的醞釀過程中，包含不同政治力量的組織動員因素。起初，國民黨方面試圖將學生運動的主要視線集中在反對英、法問題上，而中共則利用中大內的「據點」（新青社）學生，將遊行的目標「由對外為主轉變為對內為主」，促成政協會議成為運動的主題。新青社學生繞開了由三青团控制的學生自治會，在系科代表大會中取得主動，通過了遊行的決議。¹⁸⁶當時，中大內的中共黨員人數很少，分屬不同的上級組織，以單線聯繫進行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通過中央大學新青社領導成員中的地下黨員領導學運。¹⁸⁷

「一二五運動」的成功對中共的國統區學運工作來說，無疑是巨大的鼓舞，以此將學運方針從「不組織」改為「要組織」。¹⁸⁸「一二五運動」之後，新青社所組織的競選團在學生自治會的選舉中獲勝，改變了抗戰中期以後黨團

¹⁸⁴ 劉晴波等，〈中央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簡史〉，收入《南大百年實錄》，上卷，頁576-577。

¹⁸⁵ 〈沙磁區各校學生昨於市區內遊行〉、〈萬多顆愛國的心——記沙磁區各校學生遊行〉，《中央日報》（重慶），1946年1月26日，第3版。按，關於一二五遊行當日的大體情況，各報記載並無太多出入。

¹⁸⁶ 南方局青年組，〈重慶「一·二五」運動總結（初稿）〉，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頁230-231。

¹⁸⁷ 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頁43-44。據國民黨中統局調查，1946年中央大學內有中共黨員14人。見〈卅五年度各學校奸偽總名冊〉，台灣法務部調查局青溪園區資料室藏。

¹⁸⁸ 南方局青年組，〈重慶「一·二五」運動總結（初稿）〉，收入《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頁237。

學生長期控制中大學生會的狀況。¹⁸⁹

另一場是同年的「二二二反蘇運動」。在這場運動發動之初，國民黨中央原本並不希望事態擴大而影響中蘇關係。但三青團和國民黨組織系統卻暗在各校黨團中進行策動，致使抗議活動升級。¹⁹⁰因該運動主題為「愛國」，中共方面很難進行回應，中央大學的左派學生無力扭轉學運的局面。「二二二運動」展現了國民黨在大學校園中的組織動員能力，但也是戰後惟一成功的一次。

在 1946 年初重慶的兩次學生請願抗議運動中，中央大學學生均為主力軍，兩股政治力量也在戰後的校園中初露荷角，拉開了鬥爭的新帷幕。同年 5 月，中央大學開始從重慶復員回南京，中大從此成為全國學生運動的中心，校內的國共組織活動也更為頻繁。

學校復員初期，中共仍未在中央大學建立黨組織，新青社有七八十名成員隨學校回南京，組織關係隸屬中共駐南京代表團（中共中央南京局）。1946 年 12 月底，北平發生「沈崇事件」而爆發全國性的抗議美軍暴行的學生運動。在中央大學內，學生以是否舉行遊行爲題數次召開系科代表大會，會場中各派政治勢力爭論激烈，最終通過新青社成員提出的遊行提議。這場遊行是中大復員南京後舉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運動，新青社也趁此機會大力吸收成員。1947 年 5 月，因中共代表團撤離京滬等地，新青社的組織轉由南京市委學委領導。¹⁹¹

¹⁸⁹ 劉晴波等，〈中央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簡史〉，收入《南大百年實錄》，上卷，頁 580-581。

¹⁹⁰ 「二二二運動」爆發之初，國民黨中央即電令各地黨政首長，反蘇行爲「全係激於愛國熱誠之中立分子所發起，黨團事先並無主動」，要求各地進行引導，並將抗議矛頭指向中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陪都學生爲東北問題醞釀活動事致各省市當局指示處理方針電（1946 年 2 月 20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第 7 編，「戰後中國」（四），頁 638〕1946 年 2 月 20 日，重慶黨政小組臨時談話會決議由劉健群和倪文亞赴沙坪壩各校「勸導各團員」（上引「戰後中國」（四），頁 639）但據知情者言，「黨部團部一部分人（指陳立夫等人——引者注），不惟未勸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勵之，故無法阻止學生等出行」。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冊 5，1946 年 2 月 22 日，頁 274。

¹⁹¹ 劉晴波等，〈中央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簡史〉，收入《南大百年實錄》，上卷，頁 580-583。1946 年 5 月，周恩來、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重慶局（南方局）遷至南京，對外稱中共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對內稱南京局。南京局管轄上海工委、四川省委、湖南省工委和廣東區黨委

中央大學內的中共外圍組織劃歸南京地下黨領導後，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在 1947 年 5 月策動了大規模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五二〇運動」）。6 月，南京市委在中央大學正式設立黨支部，最初有黨員六七人，此後又有黨員轉入，達 10 人左右。此外，校內還有原南京臨時大學補習班的黨組支部存在，稱為「平行支部」。兩個黨支部互相獨立，互不聯繫。此後，中央大學的學生運動由黨支部領導，原臨大黨支部予以配合。194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大學黨組織組建為黨總支。1948 年 8 月起，國民黨當局開始逮捕左派學生，中大黨組織採取隱蔽措施，大部份學生黨員隱蔽或撤退到解放區。1948 年 12 月，由於撤退的關係，中大在校中共黨員僅存 23 人，到 1949 年 4 月增至 242 人。1948 年 12 月，原平行的兩個組織系統合併成新的黨總支，各學院設分支。¹⁹²

校園內中共黨組織逐漸擴充，同時外圍組織如新青社的組織力量也不斷增強。中大的黨支部建立後，黨仍透過新青社開展工作。新青社先後發展社員共四百多名，其中有兩百多名加入中共。¹⁹³

戰後中央大學內的國共鬥爭，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兩黨利用校內學生推動 / 消弭學生運動。繼 1946 年初重慶兩次學生抗議運動、1946 年底 1947 年初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及「五二〇運動」之後，中央大學學潮頻仍。1947 年 6 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檢討學潮發生的因素，有一條即「各校黨員團員不能精誠團結，積極發揮任務，校內黨團活動不足，鬆懈無力，甚或黨團之間，不能密切合一」，故通過「健全各校黨團活動力量」以爭取學生領導地位，消弭學潮。¹⁹⁴雖然國民黨及政府欲在校內擴大黨團力量，以在組織上對抗中共及其外圍組

等組織。1947 年 3 月，中共駐京、滬、渝等地代表團撤離，南京局工作結束。見中國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編，《中共中央南京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頁 1。

¹⁹² 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 年 9 月—1949 年 4 月）》，頁 55-60。

¹⁹³ 劉晴波等，〈中央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簡史〉，收入《南大百年實錄》，上卷，頁 586-589。

¹⁹⁴ 〈教育部關於最近學潮之報告（1947 年 6 月 21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五二〇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 2 輯，頁 648-650。

織，爭取學生領導權，然績效卻並不理想。在更多情形下，國民黨主要依賴黨和政府的機器防範和鎮壓學潮。¹⁹⁵此舉雖造成校外壓制性的政治氛圍，但對校內學生的政治思想和秘密政治動員並無實質性撼動。同時，學生運動也造成了校內黨派分野日漸明顯。¹⁹⁶

另一方面，校園內的國共兩黨在組織層面的鬥爭，主要是爭奪學生團體的控制權。例如，在中央大學歷史系有「歷史學社」和「歷史研究會」兩大學生團體，分別有中共和國民黨的政治背景，雙方各自推舉代表參與系科代表的選舉。¹⁹⁷在校內眾多學生團體中，最為重要是校一級的學生自治會。1946年初的「一二五運動」之後，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採直接選舉制，普選產生理事會，另設系科代表大會（閉會時為系科代表大會常設委員會）為「最高立法及監察機關」。¹⁹⁸此後，中大學生自治會每學期選舉一次，由同學組織競選團參選。常設委員會在競選期間負責審核競選團的資格，規定從事黨務工作者不得競選，並辦理製票、發票、監選和開票等事宜。¹⁹⁹雖然在公開場合，兩大對立的競選團都宣稱無黨無派，但事實上均有各自的政治背景，延續了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控制學生團體的爭奪。

相關法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自治會形式上歸學校當局指導，但國民黨學校黨部「應指導黨員團員，運用黨團力量，從事實（際）活動」。²⁰⁰同時，中共在戰後對學生自治會進行了更有力的滲透。從1946年1月起，連續三屆學生自治會的選舉，校內地下黨及其外圍組織主導的競選團都能獲勝，此後三屆主席郭亨衢、王世德和梅振乾為中共黨員或外圍組織（新青社、工社）的成員。²⁰¹雖然沒有暴露自身的政治身分，但外界從平時的政治言論和活動可看出

¹⁹⁵ 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441-443。

¹⁹⁶ 唐飛霄，《中央大學我的母校》（鉛印本，無出版地，2007，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記擇錄，1947年10月27日，頁114。

¹⁹⁷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頁195。

¹⁹⁸ 羊克，〈中大民主制度的成長〉，《中大新聞》，榜示專刊（1947年9月6日），第2版。

¹⁹⁹ 郝稼，〈中大競選武劇前後〉，《觀察》，卷3期15（1947年12月6日），頁16。

²⁰⁰ 〈釋示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之指導事宜疑義〉，《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卷4期4，頁20。

²⁰¹ 李飛，〈中大三屆學生自治會主席郭亨衢、王世德、梅振乾的革命風采〉，收入《南京大學共

郭、王、梅三屆「內閣」的「嫡傳關係」，是「一二五傳統精神的繼承者」。²⁰²

1947年5月初，中大學生自治會改選，有梅振乾和戚其章兩大競選團。其實，戚其章競選團的背後是校內國民黨黨團的直接支持，而且由蔣經國親自介入。5月2日，蔣經國在致蔣介石的信中稱：「目前正在積極佈置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之競選，此次選舉我方如能成功，則可把握南京學生運動之領導權，兒於今晚召集中大之團員同志再度商討競選計劃。」²⁰³但結果戚團落敗。蔣經國總結失敗的原因：「此次失敗之客觀原因雖多，如教授方面發起加薪運動，造成校內不滿政府空氣，再學校當局對於此次選舉始終抱中立態度，但其主要原因則在平時組織之不健全」，「近日來各學校因為物價之上漲，伙食甚差，一般情勢頗不安定」。²⁰⁴

1947年11月，中大學生自治會換屆選舉，中共地下組織確定以政治系學生華彬清（新青社社員，後加入中共）為常務理事候選人，組成競選團參選。另一個競選團以教育系學生尹毓秀為主。11月底，兩競選團發生糾紛，進而演變成學生「互毆」事件，影響甚劣。²⁰⁵隨後，校方作出決定，勒令毆打同學的朱心一退學，並對滋事學生員霖和馮玉田記大過一次。²⁰⁶此次「互毆」事件由國民黨黨團學生所發動，應屬無疑。朱心一為國民黨員，為中央大學航空系一年級學生，被中大退學後改名「朱堅白」，轉入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²⁰⁷

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頁327-331。

²⁰² 劉禹軒，〈中大競選旁觀記〉，《觀察》，卷2期13（1947年5月24日），頁16。

²⁰³ 「蔣經國致蔣中正函（1947年5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國家書（三）〉，入藏登錄號：002000000478A。

²⁰⁴ 「蔣經國致蔣中正函（1947年5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經國家書（三）〉，入藏登錄號：002000000478A。

²⁰⁵ 〈中大自治會改選起風波〉，《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1月25日，第4版；〈自治會糾紛擴大，中大學生昨互毆〉，《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1月26日，第4版。

²⁰⁶ 〈戚代校長三度佈告同學〉，《國立中央大學校刊》，復員後期20（1947年12月13日），第1版。

²⁰⁷ 〈胡雲山關於特務學生在中央大學破壞學生自治會改選身分暴露設法更名打入其他院校密函〉，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輯第3編，政治（四），頁208。

而員霖是國民黨黨團學生，而且身分和活動公開，為校內多數同學所知。²⁰⁸

在處分肇事學生同時，中大校方宣布停止系科代表大會及常設委員會與各競選團的活動。²⁰⁹作為配合，教育部因此頒布了針對中大學生選舉糾紛的新學生自治會規則。中大學生對校方停止系科代表大會活動表示強烈反對，對於自治會新章程也提出抗議。學生依舊召開系科代表大會，各學院相繼成立「選舉事務委員會」，而校方則對系科代表大會幾名常委和代表作出相應處分，學生復成立「抗議學校無理措施院系聯合會」。一時間雙方針鋒相對，氣氛緊張。²¹⁰結果是，「抗議學校無理措施院系聯合會」改組為「爭取自治院系聯合會」，後又更名為「學生院系自治聯合會」。而校方根據部頒法令組織的學生自治會的選舉則乏人問津，同時學生的院系聯合會又被校方定為非法，雙方僵持不下。²¹¹一直到中共接收中央大學，校內再無校方指導下「合法」的學生會組織。1948年7月，隨著國共內戰白熱化，政府的「法律」進入被喻為「第二條戰線」的大學校園，中央大學的中共黨員華彬清、朱成學和李飛被軍警拘捕。8月15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申言欲對「共匪職業學生」進行「操刀一割」。八九月間，中央大學有27名學生被捕，92名學生接到特種刑事法庭傳訊。²¹²

當政者雖在主觀上欲達到剷除校內中共組織的目的，但實際效果卻等於是將大部份學生推向中共一方，校內的國共之爭態勢已完成根本性逆轉。當時在中共負責國統區統戰工作的李維漢自豪地宣稱：「北大、清華、燕京、交大、中大等校，進步分子和中間偏左分子曾佔半數左右，參加統一戰線的學生佔絕大多數。」²¹³

²⁰⁸ 唐飛霄，《中央大學我的母校》，日記擇錄，1947年11月25日，頁117。此外，我採訪蕭承齡和王秉鈞兩位中央大學老校友時，他們亦提到員霖此人及其政治身分。

²⁰⁹ 〈中大學生自治會產生辦法將另定〉，《中央日報》（南京），1947年12月7日，第4版。

²¹⁰ 郝稼，〈蛻變後的中大選潮〉，《觀察》，卷3期20（1948年1月10日），頁17。

²¹¹ 郝稼，〈中大學生自治運動的新階段〉，《觀察》，卷4期10（1948年5月1日），頁16-17。

²¹² 嚴冬，〈南京大拘捕〉，《觀察》，卷5期2（1948年9月4日），頁16。

²¹³ 〈羅邁關於國民黨區學生運動的情況向毛主席的報告（1948年10月14日）〉，收入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檔案館利用部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第18集，頁578。

八、結 語

從 1927 年至 1949 年，國共兩黨及其外圍組織，或公開或秘密，在中央大學經歷了一段此消彼長、互相限制和鬥爭的歷程。抗戰爆發之前，雖然國民黨在教育行政層面加強對高等教育的統制，在意識形態層面加強「黨化教育」的力度，但在以「學術」為實體的大學內部，國民黨的基層組織力量一直十分薄弱。無論是體制歸屬還是具體活動，國民黨在中央大學的區黨部與學校本身幾乎無任何實質性的關聯。相反地，在許多情況下，校方往往會對黨部的各種活動每多掣肘，兩者多存隔膜。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既存研究對戰前大學校園內國民黨組織和黨員的忽視或是誤判。而同時期，中共的組織力量在各大學內難以生存，位於首都的中央大學更是如此。

抗戰爆發後，中央大學出現一個新的變化，就是中國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校內建立直屬區分部和支團部。這不僅是單純改變校內黨團組織的隸屬關係，更表明組織力量的擴張。同時，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在校內重建，伴隨而來的是中大校內長時間存在國共之爭和師生群體左右分化的加劇。總體而言，越到抗戰後期，中共公開的組織發展和政治活動就越處於劣勢。然而，校內中共及左翼學生團體的潛在力量始終未被徹底摧毀。另一方面，戰時國民黨和三青團勢力在中大校園得到迅速擴展，黨團員數量和黨團活動在短時間內都堪稱可觀。但視實際政治運作，我們對於國民黨和三青團在校園內動員力量的評判還須謹慎；相關文獻顯示，黨團員人數上的「水分」和政治立場上的「堅貞」程度均不足以與黨國的初衷相吻合。

抗戰勝利後，中大校內的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並未因實行「憲政」而退出學校，同時中共地下黨和外圍組織在校內恢復，活動能力陡增。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校內政治活動也愈益激烈。國民黨一方面利用國家機器對於校內的「第二條戰線」實行圍剿；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地運動校內的黨團力量，期以「組織對組織」的形式對抗中共。中共則以更為靈活的手段，藉學生運動和學生團體

兩大平台擴展實力，反制校內外的敵手。中央大學內的中共力量一般透過「地下黨——外圍組織（如新青社）——系、校學生自治會」的層級關係進行組織運作，層層貫徹，秘密策動，最後通過校學生自治會和系科代表大會的「合法」決議，發起學生抗議運動。1949年初，當解放軍飲馬長江之際，中央大學內的中共組織全面發動「反遷校」運動，學校留駐南京，校內的國民黨組織隨之消亡。被接管之後，中央大學改造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下的新南京大學。

徵引書目

一、原始檔案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
-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特種檔案〉。
- 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檔案〉。
- 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 台灣法務部調查局青溪園區資料室藏，〈卅五年度各學校奸偽總名冊〉。
-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檔案〉，全宗號：717(4)。
-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立中央大學檔案〉，全宗號：648。
- 南京市檔案館藏，〈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大分團團員統計表〉，檔號：1037-1-145。
- 南京市檔案館藏，〈三青團中央團部南京支團檔案〉，全宗號：1037。
- 南京市檔案館藏，〈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檔案〉，全宗號：1038，類號：1，卷號：205。

二、資料彙編、史料集、文集

-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出版社不詳，1941。
- 《三民主義青年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上編。南京：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1946。
- 《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周年紀念特刊》。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印，1940。
-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紀錄》。出版社不詳，1945。
-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會工作報告（三十三年四月至三十四年）》。出版社不詳，1946。
-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八月）》。出版者不詳，鉛印本，1947，南京圖書館古籍部藏。
- 《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卷（中央大學史料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國立中央大學三三級畢業同學錄》。〔重慶中央大學〕三三級級會編印，鉛印本，1945。
-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秘書處編印，《三民主義青年團七年來團務工作報告（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三十三十二月）》。重慶，出版社不詳，1945。
- 中大六十周年校慶籌備會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編，《國立中央大學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中壢：中央大學，1975。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北京：文史

- 資料出版社，1962。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 11 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 中國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編，《中共中央南京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
- 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黨務報告》。重慶：出版社不詳，1943。
- 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南京市組織史料(1922-1987)》。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
-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十八年）》，第 2 編。南京：編者自刊，1929。
-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國民黨年鑑（民國廿三年）》，第 3 編（丙）。南京：編者自刊，1934。
- 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台北：編者自刊，1954，鉛印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五二〇運動資料》，第 2 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影印本），冊 2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2 編「文化」（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2 編「政治」（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3 編「政治」（四）。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 5 輯，第 2 編「教育」（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 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等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 18 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
-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 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群眾工作》。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 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4 編，「戰時建設」（四）。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8。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5編，「中共活動真相」（四）。

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7編，「戰後中國」（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教育年鑒編輯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現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1輯103號，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

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檔選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冊1-12。台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1989。

三、報刊

《大公報》（天津、漢口、重慶），1927-1949。

《中大週刊》（重慶、南京），1941-1946。

《中大新聞》（南京），1947。

《中央日報》（上海、南京、重慶），1927-1949。

《中央黨務公報》（重慶、南京），1938-1949。

《中國青年》（重慶），1944。

《世界日報》（北平），1947，〈1940年代中央社剪報資料〉，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

《申報》（上海），1927-1949。

《江蘇省政府公報》，1927-1928。

《沙磁文化月刊》（重慶），1943。

《南京黨務週刊》（南京），1929。

《國立中央大學校刊》（重慶、南京），1938-1948。

《國立中央大學教育行政週刊》（南京），1928-1930。

《第四中山大學教育行政週刊》（南京），1927-1928。

《新華日報》（重慶），1943。

四、日記、年譜、憶述資料

「蕭承齡先生採訪紀錄」，南京市秦淮區，2007年1月2日。

〈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改定校名請願代表團李鐵錚等來呈（1928年3月21日）〉，《大學院公報》，第1年第5期，1928年5月，頁50-52。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冊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白瑜，〈懷念從政學人朱家驊與王世杰〉，《傳記文學》，卷40期1，1982年1月，頁113-118。
甘家馨，〈給國民黨帶來新觀念作風的朱先生〉，《傳記文學》，卷29期6，1976年12月，頁20-26。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鄒魯，《回顧錄》，冊2。南京：獨立出版社，1946。

胡煥庸，《胡煥庸回憶錄》。無出版地，鉛印本，1988。

胡頌平，《朱家驊先生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唐飛霄，《中央大學我的母校》，日記擇錄。無出版地，南京大學圖書館藏，2007。

徐中玉，〈半世紀前在沙坪壩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沙坪壩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懷沙坪 憶當年（續集）》。重慶：出版者不詳，1991。頁57-64。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冊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袁翰青，〈國立中央大學各學院院長系科主任教授講師助教一覽（二十六年度上學期）〉。教務處註冊組編製，油印本，時間不詳。

郝稼，〈中大競選武劇前後〉，《觀察》，卷3期15，1947年12月6日，頁16。

郝稼，〈蛻變後的中大選潮〉，《觀察》，卷3期20，1948年1月10日，頁17。

郝稼，〈中大學生自治運動的新階段〉，《觀察》，卷4期10，1948年5月1日，頁16-17。

高澍主編，《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高濟宇，〈校事瑣憶〉，《高教研究與探索》，1988年第2期，頁1-6。

康澤，〈康澤自述（五）〉，《傳記文學》，卷68期1，1996年1月，頁101-113。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等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梅嶙高，〈大學生活之回憶〉，《中外雜誌》，卷19期5，1976年5月，頁66-71。

葉楚傖，〈向學界報告幾點〉，《中央週報》，民國二十年新年增刊，1931年1月，頁14-17。

劉禹軒，〈中大競選旁觀記〉，《觀察》，卷2期13，1947年5月24日，頁16。

劉兆田，〈大學生活——兩張舊照片往事上心頭〉，《中外雜誌》，卷29期1，1981年1月，頁33-34。

鐘英，〈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我的入黨前後〉，收入華彬清、錢樹柏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五、專書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一九三八—一九四九）》。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廖風德，《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 Huang, Jianli.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t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Peter Lang AG, 1996.
-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六、論文

-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125-147。
- 呂芳上，〈民國十四年的東南大學學潮〉，收入《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冊2。台北：國史館，1995。
- 胡國台著，蔣光明、鄒巧玲譯，〈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在高校裡鬥爭〉，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9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馬烈，〈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國統區學生運動〉，《民國檔案》，2003年第3期，頁81-86。
- 楊奎松，〈論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關係〉，《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120-146。
- Hu, 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June 1989, pp. 300-323.

The Kuomintang Organization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27-1949

Jiang Baolin^{*}

Abstract

From 1927 to 1949, Kuomintang organizations maintained a constant presence a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njing and Chongqing). However, before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these organizations were very weak. There were no substan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KMT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 authorities on the NCU campus. On the contrary, the activities of KMT organizations were often restrained by the school auth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esence was minimal. The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the KMT an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Youth League increased their presence at NCU, as did the CCP. Although the CCP weaken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war, the potential powers of the CCP and the left-wing student groups had not been destroyed completely, and after the war they were extended and strengthen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rces of the KMT and the League at NCU expanded rapidly during the war as their campus membership increased and their activities became more spectacular. However, at the actual level of political manipula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KMT and the League was still very limited. After the Resistance War, the KMT and the League and the CCP's underground and satellite organizations both became more active at NCU. And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 KMT-CCP political struggle became very intense.

Keyword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Kuomintang,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Youth Leagu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